

## 編書人的話

這本書里收集了十篇貧雇農民的家史，內容以憶旧為主。回憶者以悲憤的心情、痛惡的語言和鮮明的立場，真切而深刻地傾吐了他們在旧社會遭受的大苦大難，尖銳而透徹地揭露了地主階級的滔天罪行。

也許有的過去受過苦難的中老年讀者會說：我們早就在黨的領導下翻了身，不受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了，過去這些苦難事別說了吧。更許有的青年讀者因為沒有經受過旧社會的苦難，對旧社會那種人壓迫人、人剝削人的血腥事實，感到不能理解，便抱着懷疑的態度說：過去真有這種不平等的嗎？

親愛的青年讀者們！舊社會不僅有人壓迫人、人剝削人這種不公平的事，而且多得很呢！不信，請你讀讀這本書吧，它就是活的見證。

親愛的中老年讀者們！你們在舊社會經受的大苦大難，不僅自己要永生不忘，而且還要向青年們大說特說才對哩！為什麼？常言道：憶苦方能思甜，溫故而后知新。重新回憶往昔，經常談談、論論過去，這絕不能認為是對歷史做簡單重複的溫習，更不能認為是“多餘”的事，而是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階級鬥爭的再教育。

通过苦大仇深的老贫农、下中农讲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、受剥削的历史，既可以使忘掉过去的老一辈人重新勾起过去的辛酸记忆，又可以使青年人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，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中，辨明是非，站稳立场；在生产建设中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这就是我们出这本家史的意图，也是我们希望在读者身上达到的目的。

为了达到上述目的，我们还要陆续出版一些工农家史，供读者们学习。为了出好这类读物，我们欢迎大家供给稿件，也欢迎大家提出改进意见。

1964年3月

## 目 录

苦尽甜来.....	王 生(1)
从地獄到天堂.....	苏玉勤(11)
我家三代.....	贾春永(25)
双眼睛重見光明.....	赫福有(33)
我的血泪家史.....	吳 連(42)
过去和現在.....	耿长鎖(56)
团聚.....	王淑兰(63)
永远不能忘本.....	高玉志(71)
血泪童年.....	刘长海(81)
流浪儿的新生.....	李維国(91)

## 苦尽甜来

遵化县建明公社 王 生

一提起过去苦难的日子，我就想说：“吃过黄连苦，才知道蜜更甜呀！”说到今天幸福的生活，我总觉得：“进了天堂，可不能忘掉地狱！”现在，我还保留下一间破草房，一是为了出来进去好使自己想到是怎样活过来的；二是好让子孙后代从这里看到新旧两个社会，让它当个见证人。要知道我家到底是怎样过来的，还得从根上说起。

我是王国藩社二十三户贫农中的一户，今年（1963年）五十五岁。当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父母就含着穷苦的眼泪永别了人间。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苦孩子，从十二岁起，一运气给地主扛了十四年长活，接着要了十六年饭。我老婆一生下来就跟着她母亲要饭，一连二十四年的乞讨生活，消磨了她一生的青春。我给东庄地主扛活时，说是一年三十块钱，实际上连折带扣哪年都给不够数。天下地主是一个庙的鬼，后来给本村姓王的一家地主扛活，折

筋断骨地干一年，工錢还是給不够数，除了吃的沒穿的，辛苦一年穷一年。老婆十六岁和我結了婚，房无一間，地无一壠，每年六块钱租賃了人家一間破草房。后来实在交不起房租了，就托人說好話，搬到地主王玉书家那兩間破草房里給他去看場。房子破得象透风簍，屋子里跳蚤和臭虫成堆，好歹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了。可是屋漏偏逢連日雨，搬去不多久，傾盆大雨連下了几天，把房頂冲塌了一片，屋里成了蛤蟆坑。补也补不起，拿也拿不上，一連几夜沒睡覺，老婆哭，孩子叫，我一着急，就把兩只眼睛急瞎了。眼一瞎，狠心的地主把我叫去說：

“你瞎了眼只怪命运不好，誤了我的活更是倒楣。你回家养着去吧，活錢眼下沒有，等日后再补，咱一家一姓的还能亏待了你。”我恳求了半天，还是分文沒給，就这样把我推出門来。

我有理无处說，有冤无处訴。家中柴无一根，粮无一粒，走投无路，求借无門。面对着这种天灾人祸，我心里象刀割一样。人死不了总得要活下去呀，咋办哪？老婆抱着吃奶的孩子，拉着我去要飯了。这里我說說头一天，出村不远有一条河，奔流的河水如狼似虎的怪叫，人穷胆子也就得大了，老婆把牙一咬就下了水，刚想迈步，一个大浪头就把

她打了个趔趄，心里一慌，孩子失手掉在了河里，她一喊救命，恰好从河那边跑来一个扛锄的老汉，他跳下水去紧抓紧挠地才把孩子打捞上来。孩子不理解母亲的心肠，嘴里喷着污水和奶浆，两只小手用力地抓着破烂的衣服，生怕把他扔到河里去。

常言说：“穷不过要饭吃。”我连要饭都要不起，甭说别的，连个盛饭的家当都没有。要来的东西，舍不得吃，日积月累，好容易积攒了五斤白薯，才换了个饭罐子。那时，有钱人一手托着天，世界上哪有穷人的份！我家肚皮外边的东西，什么也不是自己的，不，连肚子里的残汤剩饭，还不是求爷爷告奶奶地要来的呀！人穷狗也瞧不起，财主家的狗专瞪着眼咬穷人的肉，一朝见影子，就呲着牙汪汪地扑过来。我和老婆两腿都被咬得青一块、紫一块，旧伤疤连着新伤疤。这里山多村稀路难走，哪块石没有绊过我们的脚！哪里没有我们东倒西歪的四行脚印啊。可是，一天到晚，把嗓子喊干了，也摸不到一顿饱饭吃。饿得肚皮贴着心，瘦得皮包骨头一根棍，成了见风就倒的人。

有钱家添儿是大喜，穷人家添嘴养不起。老婆生了第二个孩子，又多了个累手的，讨要可就更难了，我们夫妻俩不知掉了多少眼泪。后来我对老婆

說：“你先別管我了，把大孩子給我留下，帶着小的逃活命吧！”那无情生活的鞭子，把我們打得妻离子散了。我老婆求亲告友，到遵化县城里給一家地主去做活。說是管飯不給錢，其实，吃的飯哪如人家的猪狗！一天到晚，累死累活地伺候地主的太太和孩子，太太一不高兴，或是孩子一哭，就得挨打受气。在人家面前，吓得走路不敢抬头，出气不敢使劲，可是怕来怕去，还是躲不过挨打。一天，地主太太見她偷吃了点喂狗的飯，就怒气冲冲地追上来：“餓死鬼，几輩子沒叫你吃飯？怪不得打你进到我家門，这条大黄狗一天比一天瘦。”說着，一棍子打了个两截，她把眼泪咽到了肚子里。自己挨打受气不算，吃奶的孩子也跟着受欺負。一次，地主的儿子又打起我們的孩子来，我老婆說着好話不让打，这时正好被地主太太看見了，她不但不說自己的儿子，还反咬一口說我們打了她的儿子：

“吃三天飽飯就忘挨餓了，沒良心的穷骨头！”嘴到手到，按住又是一頓苦打。我老婆在这里干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就把脚一踩，离开了这个狼窝。

我老婆去城里做活不久，留在家的大孩子給地主馱坏砸折了腿。我一个人天天坷坷絆絆地摸着去

要飯。这天，刮着刺骨的寒风，下着鋪天盖地的大雪，人們坐在热炕头上还冻得渾身打顫。我却穿着那露肉的破衣服挂上一根棍子，踏着沒膝的冰雪去要飯，栽个跟头，爬起来再走。走啊，走啊，脚掌冻在鞋底儿上，好容易走到高各庄的村边上，一脚就迈到个大井里，水到脖子上，冻得咬着牙說不出話来。这时，从村里走出来一个地主大少爷，他見死不救，还破口大罵：“他媽的，你睜着两眼装瞎，这么大地方故意往井里跑，把水給弄脏了，快給我上来淘井！”他罵了一頓，拔腿就走开了。我急得沒办法，正好走来一个赶集卖猪的，才赶忙用绳子把我救上来。我双手抱住他，哭不成声地說：

“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，可是你今天从井里救上了我，我还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受罪呀！……”

这个人劝我說：“沒什么，咱都是穷哥儿們，好死不如賴活着，人不該死总有一救，好好地熬着吧！”

熬了今天熬明天，越熬日子越不好过。日本一过来，要飯一碰上了鬼子兵就說我是八路軍探子，不是狠狠地打一頓，就是綁起来要活埋。我吃过了很多苦头，再不敢出村要飯了，只好舍着脸皮在本村要。这天，地主王維平正从家往城里运粮食，我





到他家来要飯，論起来本應該叫他們大哥大嫂，可是有了錢，人也就大了，我站在他門口叫了半天大爷大奶奶，王維平却六亲不认，他大搖大摆地跨出門来，把眼皮子一翻，眼珠子一瞪說：“穷小子要飯不长眼，这年头誰还打发起飯！我們連自己都顧不上来了，快給我滾开！”“你們要顧不上自己来，俺們穷人就甭活了！”我强爭了一句，再不敢吭声了。我从碰了这次釘子，一賭气宁肯餓死再不去要飯了。后来有人劝我說：“你还是出去要要吧，別在家里等死了。”我說：“人家財主家不給，光朝穷主儿要，让人家跟咱一块挨餓受罪，心眼里过意不去呀！咱生来就是受苦的命，走到天边也枉然。”此后，天天让两个孩子上山打点野菜填填肚皮，我餓得整天躺在炕上不敢动弹，气喘咳嗽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，在那一連几十年苦难的岁月里，老婆也落下了一身病，两个孩子早瘦成了見火就着的干柴棍，全家老小四口，就这样气息奄奄地活了一天算一天。

誰說穷富是命定的？

全国一解放，阴天变晴天，千年鉄树开了花，穷苦人有了出头的日子。我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受尽折磨的穷苦人一样，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，全

家四口改面換容，笑逐顏開。土改時吐盡了幾十年來在心里凍成了冰的苦水，用憤怒的拳頭斗倒了地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。我們夫妻倆樂得合不上嘴。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還會有窮人的天下！第二年春天，村主任王國藩給俺們送來了種子，還幫我們把地種好。只因為這裡山高地薄，又沒有家底，土地供應不好，一畝地打個三升兩把的，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，可窮人家還是不能徹底翻身。

1952年秋天，王國藩找到我家來說：“二叔二嬸，黨號召咱們窮人們組織起來，成立合作社，你們看咋樣？”並說明了辦社的好處。我們一聽，打從心眼里高興：“共產黨不會往瞎道上指咱，你就張羅去吧，咋辦咋好，你走到哪裡，俺們就跟到哪裡。”說辦就辦，二十三戶貧農湊了三條驢腿，就辦起了一個赫赫有名的“窮棒子社”。當時，有很多人站在旁邊看笑話：“嘻，鷄毛還想上天哩，一群窮棒子還弄好了！”我們在王國藩的領導下，人窮志氣大，百人一條心，互相幫助，同舟共濟，這家缺了吃的，那家忙給送來。冬天，王國藩帶領大家上山割柴草，夏季刮草壓綠肥。我們把自用有餘的柴草和糞肥賣了很多錢，這些錢除買些糧食吃，還置買了些大車、農具和牲畜。集體力量大，土地也

听話，1953年秋季来了个大丰收。大囤滿，小囤流，我家分了三千三百多斤粮食，还分了八十五万四千块钱（旧人民币）。入社后，年年增产，我家吃不清花不了，年年还要卖给国家余粮。经济一翻身，生活一富裕，我就到医院把瞎了二十二年的眼睛治好了。这是共产党叫我一家人还了阳，拨开了我眼里的一团黑云，让我重见了青天，如今才知道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。这双二十二年没见亮的眼睛，看见了新的太阳，新的天地；我不管往哪里看，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。我用这双明亮的眼睛，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，一眼就看准了合作化的道路是唯一富强的道路。十余年来，我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奔走着。随着初级社、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逐步建立和发展，我家的生活日新月异，步步向上，贫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1957年，我用积累下来的八百块钱，在住了二十多年的那间破草房的院里，盖起了现在这五间称心如意的大北房。你看，里里外外粉刷得雪白透亮，屋里安上了电灯。东头屋的迎门墙壁上，我贴上了毛主席的巨像。像下面放着靠山镜，北墙有一对通红的大板柜，柜子里放着四季的衣服；右边的炕头上，还有一落干净整齐的被褥；桌子上摆有茶壶、茶碗、暖水

瓶。隔着寬敞的玻璃窗，你可以眺望南山上的四时风光。

我老婆时常对人說：“我一有空，总要对着鏡子照照要过二十多年飯的老脸；王生也常对着鏡子刮胡子刮臉，俺老两口这咱个比年輕人搞对象还要点样哪！”我更是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：“这咱我不光眼亮了，耳朵也灵了，一打开收音机，能听到天下大事，从哪里找这个社会去！”我想，也只有在这个社会里，才能使我家彻底結束几十年来辛酸苦泪的历史，一步登天地过上了真正的“人”的生活啊！你看，那个从河里捞上来的儿子和受尽地主欺凌的儿子，早已长大成人、安家立业了。面对着这种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，我常翻着自己苦难的家史，反复地告誡着自己的孩子們：“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，可不能一飽忘百飢呀；忘了吃苦的日子，再吃蜜也就不甜了。”

王 洋整理

## 从地獄到天堂

天津化工厂工人 苏玉勤

我上下班的时候，經常从一座破土地庙跟前走过。有时看見它，往日的泪水就一下子涌到心里。这里的冤，这里的仇，有誰知道呢！

記得是在一个假日的早晨，我領着两个女孩子上街去了，路过土地庙門前，特意到里边看了看。小庙的房山东倒西歪，沒門沒窗，里边堆滿了碎石烂瓦。她們天真地問：“爸爸，看这破庙干嘛？”我沉思了一下，心想，她們成长在新社会，这庙里的苦和难，她們怎能知道呢！我对她們說：“看看吧，这座破庙就是你們的一課书！”

晚上，在銀亮的电灯底下，她們作完功課，忽然問起看庙的事情。我就給她們讲起了过去。

咱們老家在天津南郊的葛沽鎮。我二十九岁那时候(1939年)，咱家穷得一壠地也沒有，租种地主的园子地，累死累活地干一年，吃不飽穿不暖，末

了，还欠下租子。地主逼着要，說：“砸鍋卖鉄也得把租子交上！”逼得全家无路可走，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，你奶奶受惊带气死在了葛沽鎮。她临死时把我叫到跟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小子，你爹死得太早了，我穷苦一辈子，掙一口吃一口。往后掙一口气！……”說到这，她咽了最后一口气。全家人哭了一夜，把老人卷巴卷巴埋了；家里沒吃的，第二天就拿着棍子討飯去。生你秃哥哥那个媽，每天上地挖苦菜，我和秃子的哥哥每天要飯，富人家要不来，穷人家沒有剩飯，两个人要一天还不够自己吃的，哪能顾住全家五口呢？

邻居們怕咱全家餓死，都說到外边找活路吧。我想，也許能行，我餓死不要紧，別把孩子餓死了，他們还小哩。可是，到哪去呢？哪里才有穷人的活路？为了不被餓死，我用一根扁担、两个破筐挑着七岁的秃子和他五岁的弟弟，領着秃子的哥哥和你那个媽媽，頂着眯眼的風沙，漫行在一眼望不見村的盐碱地带。

动身时，除了要来的糠餅剩飯，野菜团子，一点盘費也沒有。向富人借点錢吧，他們說：“誰借給你这穷小子！到外边还不是让狗吃了！”地主富农嫌咱死得慢，哪还肯借給錢。沒别的办法，还得

靠要飯走路。

开春的风沙，天天刮个沒头，在荒野里行走，大人睜不开眼，孩子哭哭叫叫，想找个避风的地方也找不到。可是，肚里餓得咕咕叫，哪有劲挑他們两个呢，我挑一会就得歇一会。你秃哥哥那时候瘦成一把骨头，眼窝子塌得象酒盅一样，站起来风就可以吹倒他，他哪能自己行走！你那个媽媽心痛我受累，看我气喘的厉害了，有时候硬叫秃子下来走：“别把你爹累死了，能走几步你就走几步。”他那时候还小，哪懂得这些！我一听这，心里痛苦得不敢再扭头看孩子，眼泪止不住地往嘴里流，硬挺着腰板担着孩子赶路。

来到了塘沽，心想好好歇歇脚吧，这是个大地方，給孩子們要口飯吃，攢攢劲再往前走。誰知道在这里要飯比在乡村还难，大工厂进不去，商号里連在門口站站也不让。喊爷爷叫奶奶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滾出去，再来这挡道打断你的腿！”有一次，秃子的哥哥到一个飯館要剩飯，那时候要飯的人也多，不知是誰偷了人家一个饅头，掌柜的錯以为是他偷的，沒头沒脸的就是一巴掌，一下子打倒在路沟里。护家狗也依仗人势，上前就咬他的大腿，要不是行路的好心人把他拉起来，就得被狗咬个肉



烂。他含冤抱恨地走回来，一点飯也沒有要了，你那个媽一見，鼻子一把泪一把地擦不完。她只能劝大孩子多小心留神，不好要的地方就别去要。可是，恨誰呢？我說：“别再让孩子难过了，穷人挨打受气，哪有說理的地方！”

就这样，一路上吃苦要飯，哪黑哪住，街头巷尾，馬路沟，大树边，就是穷人的炕头。葛沾到汉沾不到百里路，我們就走了七、八天。要不是心里有个盼头，盼望到汉沾找点活干，这一段路再走十天也是走不完的。

可是，到了汉沾怎么样呢？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，哪里也沒有穷人的活路，到哪里还不是受气挨餓！在汉沾，也和别处一样，上无亲戚，下无朋友，沿街討飯的人成群結队，他們找不到事做，咱哪能找到！我后悔不該来这里，有心领着孩子返回去，可是，返回去不还是照样挨餓！这百把里路就是鬼門关，闖不过去，十有八九就得死在半道上。我对你那个媽媽說：“哪里也沒有咱穷人抬头的地方，豁出五条命，咱就在这里混吧。”白天，全家人分头出去要飯，晚上，一家人就住在那間土地庙里。这庙，你們都看見过，一个門口两个沒樞的窗窟窿，沒有門板，只有四个墙凸晃，冬天大北风直

往屋里灌，热天蚊子落满梁，可是，再脏再臭也得住。地主资本家住高楼瓦房，穷人没房没地，不住这住啥！要是遇上刮风下雨，不能出门要饭，一家子就得挨饿。

这样过了半年，有人对我說工厂招人。磕头作揖，死說活說，我算进了东洋化学厂（現在的天津化工厂），当建厂杂工。好不容易进厂做工了，每天大清早起来进厂，先把門口写着自已名字的白牌翻过来，給日本人鞠个躬再去干活。那时候，每月挣四十斤粮食，說是粮食，其实淨是糠皮皮，哪够五口人一个月吃的！有了病不給粮食，出了工伤也不給粮食。就是发下了粮食，把头、狗腿子还要剝削你，把好的給你换成次的，把次的給你换成更坏的。要是高兴了，他們就发給你，不高兴，你要也不給。咱們沒吃的，你那个媽媽还得抱着二小子挨門討飯。

不料想正在困苦难熬的时候，秃子他哥被日本鬼子抓劳工抓走了。我在厂里干活，一点也不知道。家里正指望他要点飯吃，他这一走，孩子們吃啥呢？你那个媽媽的眼皮哭肿了，怀里抱着孩子在庙台上等我回来，盼我想个办法搭救孩子。可是，那个世道誰还敢去讲理！我們忍冤含泪，到車站去看望秃他

再... 再... 天... 里...



... 走... 不...

哥，他被关在一间黑屋里，说是很快要被火车运走。他见妈妈来看他，满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，低着头直哭，他妈把留着给三小子吃的两个仅有的糠窝头给了他，让他别忘了爹妈，不管走到哪里，要来个信。秃他哥知道兄弟们都沒吃的，不肯接过那两个窝头，在窗口让来让去，看见这，我的眼泪也流个沒完，我说：“你妈给你，就收下吧。爹养了你这么大，想不到落到这样的下场，以后，你要能回来，就想法回来！”谁知道这么一说，惹了祸，看门的警察把窗子咔嚓一关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。眼泪只好往肚里流。他走时，才十二三岁。从此，就再也沒见他的面，后来才听说他被折磨死在煤窑里。

这以后，要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三天两头刮海风。我和孩子还穿着露肉的单衣，在庙里冻得坐不住，要饭更出不去了。我每天下班回来，总要到工厂大伙房里要点泔水，自己舍不得喝，留着给孩子们吃。要来泔水多吃点，要不来就饿着。

有一天夜里，饿得我实在睡不着了，起身就要上工厂去，想把大师傅要泼的泔水提来，你那个妈妈拦住我说：“孩子他爹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还穿着

单衣服，把我的棉裤穿去吧。”她说着，便把她那旧棉裤脱了下来。我说：“我穿了，你穿啥呢，在庙里不是更冷吗？”她看我难过，就硬递给我。一个男人怎能穿红裤呢？不穿吧，太冷，我想了想，便把它翻了个里朝外。

到了厂门口，日本兵问我干什么的，我说上班的（如果说要泪水是不行的）。浑身上下把我搜个遍，什么也没搜出来，还不叫我走，逼着我叫把衣服脱了。不料这一脱，日本兵大惊大叫起来：

“啊，你的红军的干活，八路！”他们睁大眼睛看着红裤子，忽然，从兜里取出哨子鸣的吹了起来，一会，十几个持枪的鬼子兵就把我围拢起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绑在电线杆子上。一个日本军官大声问我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工厂的工人。”他摇摇头说：“你的八路密探，红军！”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。他们不信，强迫我承认是八路军，便用铁丝把我两个大拇指紧紧拧在一起，铁丝上拴着一根绳子，把我吊在警察室的房梁上。我只觉得钻心的疼，棍子、板子又噼里啪啦地打在身上。冻紫的肉皮流出了鲜血。后来头一昏迷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他们用凉水浇我的头，我渐渐清醒过来。这才

知道我已經躺在凍地上。他們還是逼我承認是八路軍的密探。我說啥呢，要說，只是對他們的仇和恨。我咬着牙沒說一句話。他們從我嘴里什麼也沒得到，更凶狠起來。只見隨着日本軍官的手勢，上來幾個兵把我架起來，我知道他們又要來新的酷刑，我想，來吧，反正是這一條命。恨，我深深地記在心里。他們從火爐里夾出通紅的煤塊往我身上燙，背上的肉，燙得滋滋地響，一種難聞的焦臭味充滿全屋。他們還不放鬆，一塊接一塊地往身上燙，直到我再一次昏了過去，他們才放下火鉗，把我扔出屋外。

我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已經大亮了。廠門口擁擠着進廠的工人，大家見我被打成這個樣子，誰能不生氣呢？不知工友們說了多少好話，才把我放了。工友們含着淚水，忍着憤怒，把我抬到了那座破廟里。你那個媽媽見我成了這個樣子，一頭扎在地上哭個沒完。怎樣活下去呢？她心里的苦已經够多了，我又成了這個樣子，大人哭孩子叫，要不是有這些孩子，我真不想活下去。第二天，我的傷口腫了老高，不是工友們借給錢買藥膏，我哪能活得下去！

一晃七天過去了。可是，人歇着，肚子可不能

歇呀！一家人靠我吃飯，我只得強打精神，忍着疼痛去上班。別人的糧食發下來了，偏偏沒有我的糧食，他們說七天不干活不給糧食。世上就有這樣的不講理，干了活，挨了打，糧食還不給。我把這事向工友們說了，大家氣得肚子硬崩崩的，全說找日本人說理去，不給蘇玉勤糧食就不干了。這事傳到翻譯官耳朵里，日本人也有點慌，經過工人們左說右說，才發給我一個月的一半糧食，那另一半就硬不給了。

敵人的心，就是這樣狠毒！他們明知道咱全家忍飢挨餓，還要克扣你的糧食。我為了給家里省點糧食，晚上下了班不回家，便到大伙房要點泔水，自己喝一點，給家剩一點，誰知道就在這兩三天內，三小子在廟里餓死了。你那個媽媽沒有衣服，不能出門，等着我下班埋掉他，一直等到第二天，還不見我回來，不能光守着尸首，她便叫禿子去把三小子扔掉。禿子那時候才七歲，哪能抱動五歲的死孩子，他怎能忍心把弟弟扔掉呢！他把弟弟抱到了溝邊，再也抱不動了，只知道冲着弟弟哭，不肯把弟弟扔掉，守着死去的弟弟在溝邊呆呆地站着。鄰居們告他說去找你爸爸吧，他才想起到廠里找我。那時候我一聽這，心象碎了一樣，命，眼看着

一条一条死掉了，还有什么活头呢！有心不再去看三小子，看到他更觉着没法活下去，可是不能把孩子扔在沟边呀！他活着没有遇上好世道，死了，要让他安安稳稳地躺着。我含着泪水，把他埋在沟边。走回家来，你那个妈妈连气带饿，坐在地上连走都走不动了，脸肿得黄蜡蜡的，浑身上下，也全肿起来。下身没有衣服，围着一片破麻袋。我递给她一盒泔水，她放在一边，说：“给孩子留着吧。我死了，也别让秃子再死了，他是咱家的根，长大了，叫他知道妈妈是怎么死去的。”我一听，坐在她跟前抱头大哭，秃子在妈跟前也哽咽起来。有啥法呢，旧社会把人逼成这样子，没地方出气，没地方说理，生了气只好去哭。泪水填满了肚子，哪还再想吃！我劝她吃一口，她不吃。为了给家里挣口饭，我忍着饥又去上班了，临走我对你那个妈妈说：“吃吧，为了活下去，咱不能不吃，明天我给你多要点泔水。”

其实，哪能多要呢！厂里的泔水，全被伪警察把持着，他们说喂了猪能吃上肉，喂了穷人是白搭。要不是有好心的大师傅给我偷偷留点，向警察磕头也要不来。我说多要点，是安慰她呀，她要再有个好歹，留下孩子可咋办呢！



这时，庙，我們也住不成了，村里的富人們嫌我們把庙住脏了，硬逼着我搬进一座比庙还潮湿的看守菜园的小泥棚土屋里。进去站不起身来，只能在里边躬着腰走。我上班后老是担心下雨天会把你那个媽媽砸死。

可是，不愿意朝那走，旧社会逼着你非朝那走不可。三小子死后不到七天，外边大雪飘飞，我正在鍋炉房滿头大汗地干活，你秃哥哥忽然哭着跑来对我說媽媽死了。

刹时，我象傻了一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，呆呆地站在門口，望着漫天大雪。工友們問我出了啥事，我說不出話来。我头前走，你秃哥哥在后面紧跟。到家里，你那个媽媽的身子已經冰凉了，硬挺挺地躺在潮湿的草窝里，雪花，飘进屋里，落在她的身边。看得出来，她昨天晚上就死了。临死，沒和她見个面，沒說一句話，我对着她的尸首說：

“我对不起你，你死得好苦啊！”

泪水，已經哭干了，我不再哭了。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，自从大孩子被鬼子抓走以后，她的气，一天天多，她的恨，一天天深，她的肚子，一天比一天填不飽。是誰給她带来的恨呢？是万恶的旧社会，是我們的階級敌人——地主、資本家、反动

派……

活着，有苦他們不管，死了，他們更不管你。你那个媽媽的尸首躺了三天，想埋葬，工厂的资本家不借給錢。还是工友們帮助咱，借了領席，算把她埋葬了。从此，我离开了这座冰冷的小屋，全家五口死去三口，我和秃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

可是，我还得上班。把七岁的孩子放在哪？再放在庙里，被人偷卖了咋办？让他进工厂，警察象狗一样在門口把着，哪肯让进去！但总不能把他放在街上不管。从死里走过来了还怕什么，我大着胆子把他領进厂来。警察拦住不让进，我說：“家里死得沒人照顾他了。”他們說：“滾，誰問你这个！”举起枪托子就往外赶秃子，我憋了一肚子火，就和他們讲起理来。工友們围了一大圈，全替我說好話，警察見苗头不好，怕把小事鬧大了。才答应把他带进来，不許他来回走动，只能在一个地方呆着。就这样，到上班的时候我去干活，下了班爷俩盖着一个草袋子睡在烟囱旁边。大鍋內濺出的滾开的卤滴，时常燙在我們身上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，熏得睡不着，实在沒办法了，就用洋灰紙蒙住头睡。一直到汉沽解放，我和你秃哥哥才从这个黑暗的臭窝里走出来。我們这些从前受压迫受剝削的

工人，現在成了主人，政治地位提高了，生活也改善了。

不是新社会，我那还能建立新的家庭呢！

不是共产党，你秃子哥能翻身嗎！

現在，我們全家住的是新工房，大儿子和大女儿也有了工作，和我一起在天津化工厂工作。三个小女儿有两个已經上了学。领导上對我們上了年紀的工人，处处关怀照顾，就是有点头疼脑热的小病，也亲自来家看望我們。全家人高高兴兴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和过去比，真是天上地下。思前想后，我不能忘記过去，也不能让孩子们忘記过去。1963年春节，秃子領着媳妇来向我和他继母拜年，我們全家九口欢聚一堂，我就又想起了土地庙里的事。我說：“現在咱們生活在天堂里了。在旧社会咱們該多么苦啊，有誰知道这座庙里死过多少人呢？你們要記住这座庙，記住咱們工人階級的血泪史，記住現在世界上，还有些地方有許多象我从前在土地庙里生活的人。”

孩子們說：“爸爸苦难的过去，我們永远不会忘掉它。”

## 我家三代

石家庄市大兴纺织厂工人 贾春永

1963年元宵佳节的晚上，我们一家六口人，在暖烘烘的屋里欢度佳节。大家围坐在一张桌旁，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元宵，孩子们的脸上都挂着无限的喜悦。我的大女儿小秀，二女儿秀珍，突然提出要我们给她们讲故事，我答应了。可是讲什么呢？我想了一下：要想使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苦，什么是甜，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，就必须使她们了解过去，知道老前辈的人是怎样走过来的，永远不要忘记本。于是我就说：“好吧！我就给你们讲讲咱家三代的历史吧！”

咱的老家在南宫县徐达村，三代都是穷人。人们都说徐达村的水苦，可是那时咱家的生活比苦水还苦三分。我的祖父兄弟二人，家里只有八亩老碱滩，起早恋黑，辛苦一年，秋后收不了多少粮，没饭吃，就向地主张洛石借债。常言说：地上的冰是凉的，地主的心是狠的。驴打滚的利钱，没有几

年，就把四亩地滚到了地主的手里。我爷爷、奶奶气病交加，很快就都死了。

当时留下了父亲他们兄弟三个。大伯因生活所迫，十二岁就远离家乡，进北京一家铜器店当学徒。父亲和叔叔寄住在二爷家里，整天不是下地挖野菜，就是挨户讨饭吃。父亲十一岁那年，春天里青黄不接，家里没饭吃。父亲领着六岁的叔父，背上行李卷，怀里揣着破饭碗，一路讨吃进京去找他们的大哥。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。兄弟三人相逢，抱头痛哭一场。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南山有豺狼，北山有虎豹，那时的北京同样是穷人的地狱。父亲和叔父年岁小，学徒没人收，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粪场，当了拾粪工，经常挨粪霸工头的毒打，时刻还有被拐骗的危险。北京呆不下去，只好又讨着饭回到家乡来。

父亲和叔父回到家来，因生活无着，叔父过继给人家走了，父亲仍寄居在一个当家伯父家里。当他十三岁时，就到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广宗县一个地主家里扛小活。在那个活地狱里，父亲不论风里雨里，不论酷暑严寒，给地主拼死拼活地干了二十年，只能混一碗淡饭，去时一身破衣裳，回来更是一身烂了。

父亲回到家来，一边种地，一边打短工，抽时间还刮碱土熬小盐，忍饥挨饿攒下了几块钱，一直到四十二岁上才和母亲结了婚，后来就生了我和弟弟、妹妹。孩子多了，吃饭的人多了，偏偏就在这时（1918年）又发大水，地里冲了个溜光平，寸草没收；第二年又闹了旱灾，滴雨未落，人们吃光了树皮、草根、谷糠，好多人浑身发肿，指甲发青，拉不下屎来。没办法，父亲说：明知是刀山也得上。又找地主张洛石的儿子张四瘫子借了十块钱，仍旧是驴打滚的利，两年就滚成四十块。地主十冬腊月来逼债，又硬夺去了从爷爷手里留下来的那四亩地。从此，家中就一壠地也没有了。在旧社会里，穷人的命运正象一首民歌所唱的：农民头上三把刀，租子重，利钱高，苛捐杂税多如毛。

一家人的生活没了办法，父亲决定全家下关东。那天大清早，正当地主杀猪打酒，张灯结彩过年的时候，父亲背着铺盖，母亲携着篮碗，抱着十个月的弟弟，我和哥哥（母亲带来的）、妹妹跟着，离开了徐达村。走出了村头，父亲站住了，他泪水满怀地回头看了看，好象说：“别了，故乡！”这才沉重地挪动着脚步，扯住我们往北默默地走去。

我們來到了石家莊，母親在路上受到了折磨，說什麼也走不動了，一家人把鐵路旁的大石橋洞當作安身之處。在那風雪寒天里，一家人肚里無食，身上衣破，蜷縮在四處透風的橋洞下，幾個孩子又哭又叫。這時有一個鐵路工人，送來了兩個盛煤的破筐，讓烤火取暖。父親感激地直給磕頭。這個工人說：“老兄不要這樣，我也是窮人，天下窮人是一家。”這樣一家人烤着火，才熬過了這個可怕的夜晚。



第二天，父親到處奔走，用僅剩的一點錢，在同義街糞場租了一間秫秸搭成的房。有了房住沒有

飯吃，光靠討吃又養不住全家，父親咽着淚水把最小的弟弟賣了，換回了四塊錢。四塊錢拿回家來，不見了弟弟，全家人又是一場悲痛。可是，當時的物價一天三漲，四塊錢怎麼能養家糊口呢？父親母親沒有辦法，只好又把七歲的妹妹賣給人家做童養媳。唉！這簡直是割父母身上的肉啊，一家人就這樣活活地拆散了。賣了妹妹雖然人少了一口，困難一點也沒有減輕，還是糊不住口，照舊要去討飯。那日，父親整跑了一天，一口干糧都沒討回，他揀了一塊爛西瓜吃，從此就一病不起了。就在這節骨眼上，我大哥被抓了兵，弟弟討飯失蹤。一宗宗的不幸打擊着父親的心，他痛苦悲傷，他恨世界上的富人，他恨吃人的舊社會，一氣之下，閉上了雙目。沒有棺材，揭下了炕上鋪的破席片，裹住了父親的屍體，埋在了荒郊野外。就這樣，不到半年的時間，全家七口人就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了。

父親死后那年，我才十二歲，但是悲慘的生活使我懂得了很多事情。為了減少母親的痛苦，我偷偷找活干，拾煤核，打短工，學理髮。可是走到哪里，都是挨打受氣，臨了還是兩手空。後來，聽說大興紡織廠招收童工，我決心去報考。那時我身上的污泥足有銅錢厚，哪里還象個人樣，母親把我領



到水坑里洗了个澡，换了一件干净的破衣服。我就蹦蹦跳跳地和一伙穷家孩子进了大兴纺织厂。工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是一母双胎，工人们出入门口象罪犯一样被门警里外搜查，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进厂，干活不下十二个小时，稍有不是就得挨工头的皮鞭毒打。虽然整天没命地干，做一天工挣的钱还不够娘儿俩喝稀粥，母亲除了给人家浆洗衣服换几个钱外，还得要饭吃。在旧社会资本家的工厂里，做错一点事也得挨罚款，有了病不能上班就被开除。有一次，我干活累得满身是汗，直起腰来喘口气，不料被工头看见了，挨了一棍子。一位挡车大姐等工头走后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工头啊，不打饷，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。以后给他们干活得多个心眼呀！”有一次，下班回到家里因没有下锅米，没吃上饭就又上班，哪里有劲呀，站在机器旁，眼发黑，腿发软，手不听使唤，摆管的时候碰断了细纱，被一个姓张的把头看见了，他用木板劈头劈脑地打来，我顿时觉得天昏地转，摔倒在地上。工友们送我回家，我一头倒在母亲怀里，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娘！我不去做工了，把头专找咱穷人的岔。”母亲见我满脸血迹，热泪簌簌地流下来，落在我的脸上。过了两天，

家里因为沒粮吃，母亲为难地对我說：“孩子，工厂是火坑，你也得去跳呀，咱穷人还没有出头的日子。”就这样，我擦干了眼泪，提心吊胆地又进了工厂。

资本家是吸血鬼，千方百计吸吮着工人的血汗。1933年旧历年前，又要免去工人的补助费。工人们被激怒了，起来斗争。在工会的领导下，高喊着“打倒资本家”的口号，开始罢工了。资本家石凤翔咬牙切齿地說：“宁把钱给了董旅长（当时国民党在石家庄的驻军头子），也不给你们这些臭工人，你们罢工，等着瞧吧。”果然罢工后，国民党的大兵进了工厂。可是工人们谁都不胆怯，不畏缩，罢工的队伍包围了厂长办公楼。吓得石凤翔从窗户里逃跑了。这次罢工得到了胜利，增加了工资。从这件事，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穷人要想翻身，必须打倒资本家、地主阶级。我还认识到，穷人并不是命苦，是因为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，要想翻身，当家做主人，必须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。

1938年，我二十岁上，和一个逃难来石家庄的妇女结了婚，从此才成了家。

工会给工人们讲了许多打倒资本家，工人翻身的道理。我们整天盼望着黑夜快快过去，太阳早早

出来。1947年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輝照亮了石家庄——石家庄解放了。从此，我們由奴隶变成了工厂的主人。时代变了，我們工人的地位也变了，我心眼里有說不出的喜悅。我恨不得把一天变成两天，多給自己的工厂干点活。1948年11月25日，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，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又被評为劳动模范，上了光荣榜。共产党来了，咱家的生活也天天向上。你們知道，小秀高小毕业后还参加了工作，秀珍也上了小学。每天三餐，吃的都是純粮細面，平常还能吃上肉，改善生活。这些，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。咱們要記住，不能因为今天的生活好了，就忘了过去的苦，更不能因为生活比过去好了，就不想革命了。

咱家三代的血泪史，要你們永远記住；你們要永远听党的話，听毛主席的話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革命到底！

## 双眼瞎重見光明

迁西县照燕洲村 赫福有

1963年春天的一个清早，我看着从东山升起的紅太阳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！我这个四十九岁的人，竟变得象个孩子，哈着腰喘着气，抹着滿脑袋汗水，順着层层梯田，向山頂攀去。我坐在山頂，往山下一看，心里好豁亮啊！山下黑紅色的大地上，一片青堂瓦舍。那是医院，那是中学，那是喧鬧的机械厂，平坦坦的大道上，正跑着拖拉机、汽車，还有公社那么多的牛群羊群……我的眼简直不够用了。

同志，这个景象，对你們來說，也許一点也不新鮮，可我是双目失明整整二十二年的人啊！今天猛一睜开眼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說我能不高兴嗎，能不看見什么都是新鮮的嗎？

### 忆从前辛酸事 对地主仇恨深

我原来是有眼睛的，在二十二年前，我突然瞎

了。你知道，一双好好的眼睛，冷古丁的啥都看不见了，这有多苦呀，叫我多么急呀！

我好好的一双眼睛为什么瞎了呢？就是那万恶的地主把我逼瞎了的！

我十五岁那年，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，都落在我的肩上了。那时妈妈闹病，家里上无片瓦，下无壟地。爸爸、哥哥扛活挣的工钱不够还高利贷的，后来妈妈连病带饿，就被苦难折磨死了。爸爸、哥哥都是脾气暴躁的人，妈妈死后，他们心里一急，都得了暴发火眼，再加上地主逼债，两个人的眼疼得看不见啥，后来都瞎了。我从十三岁给人家放羊，年岁小气力不足，工钱凭财主们的“赏”，怎么能供全家吃饭呢。爸爸和哥哥，都不能干活，全家活命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。可我又有什么指望呢？东家在农忙时节可以用你，农闲时节可以随意撵出，饭碗说丢就丢，我没法养活爸爸和哥哥。

1933年，我从东三十二岭的地主家回来，这是我第三次被撵出来了。撵出来，就是打了饭碗，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呀！我在回家的路上走着，心里愁闷着，到哪里去呢？忽然想到了姐姐，姐姐嫁到了照燕洲村，他们村有不少的高门富户，到那里托个人情，说不定会找个吃饭的地方。可是姐姐问遍全

村，只有个姓宋的财主说要用人，还提出要亲眼相人。相人，咱倒不怕，我衣衫褴褛，泥脸泥腿，可真是个好劳动力，还怕相嘛。我就到地主家去了。宋财主挤了挤两只小眼说：“眼睛倒很机灵，样子还算老实，好吧，明天上工，工钱嘛！以后再说。”

### 天下乌鸦一般黑 哪个地主心不狠

我尝够了被撵的滋味，心想，这回到宋家又有了个饭碗了。到了宋家，我还是放羊。从打上工起，我就把全力用在这五六十只羊身上了。哪里有肥的草，我往哪里去放，不怕路远和山道不平，每天，我都想办法，叫羊吃得饱饱的。放了一个多月，这群羊个个膘肥体胖。长工们常夸我：“福有这孩子真行！”我听了，心里总是难过，心想，穷人们为地主拚死拚活地干，他们还那么狠心，想要就要你，不想要你就让你走，这世道多不公平呵！我就这样尽心地干，地主还故意找岔子，恨不得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！有时，他找出点毛病来，不是罚我一天不吃饭，就是扣工钱。那年阴历六月十三，过去迷信说法，这天是龙王爷接闺女的日子，照当地习惯，家家户户都吃饺子。扛活的人，都盼望这

天，为的是吃一顿好饭，换换口味。可是地主在这一天，也更加精心地挑疵了。那天饺子刚放在桌子上，地主宋德喜恼怒地跑到桌前，指我大骂：“小崽子，我那瘸腿羊羔子那去了？”我一听，脸唰地变了颜色，刚要送到嘴里的一个饺子，脱筷落到桌子上，这时，宋德喜劈头给我两个耳光：“给我找去，找不来要你的命！”

太阳象一团火，地上的沙土烫着我的脚板，我的肝火，比火还烈，象把我的心都烧焦了。我在山路上跑，心里想，我为你家的羊这样出力，放肥了你的羊，就是摔死一个小瘸羊羔，算得了什么？就立刻把我撵出来，连饭也不叫我吃！我爬过高山险岭，终于找到那只瘸羊羔了，他摔死在山崖下，我噙着眼泪，把它背了回来。地主一见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命令他那如狼似虎的儿子：“把他绑起来，叫他给羊偿命！”三个地主羔子应声扑过来，扭过我的胳膊上了绑，吊在羊棚过梁上，接着是一阵羊鞭，打得我血迹斑斑，昏了过去。后来，东家打累了，回屋去歇着，几个伙计们才偷偷把我解下来，送我到姐姐家。后来由姐姐作主，请人说和，扣下我六个月工钱，赔偿了摔死的那只瘸羊羔，才算了事。

## 一家討飯走他鄉 父親跌死在山下

我和爸爸一樣，也是個倔性子，癩羊羔是自己落崖摔死的，地主這樣打我，還扣我半年的工錢，他們哪把我當人看呢！難道我的命不如他的癩羊羔值錢？呸！窮人有窮志氣，我就不咽這口窩囊氣，我非跟地主拚命不可！可我氣頭一上來，兩眼突然無光了，眼前好象蒙上一層雲霧，看東西渾濁不清，覺着天旋地轉，我眼睛這樣，怎麼跟地主拚呀，眼看不準東西不是光找挨打嗎？我好苦啊，難道我的“命運”也跟爸爸、哥哥一樣嗎？也要變成瞎子嗎？我向爸爸、哥哥訴了委屈，說了我的心願，等養好眼，去找地主算賬。他們勸我，不要去拚命，全家只剩一個有眼的人，就是討飯吃也得有個有眼的人拉着呀！過幾天，咱們去北口外討飯，忍耐一個時期，將來總會有出頭的日子。我的眼睛養得差不多了，我就用簍子背起全部家當，揹扶着爸爸和哥哥，我們踏着冰雪，頂着寒風，順着羊腸小路，攀登着陡峭的山嶺向長城外走去。萬沒想到，走着走着爸爸一脚邁空滑到山下。我回頭一看，爸爸正在山下的石頭上掙扎，我跑到他身邊時，他已經死去了。我和哥哥哭呀哭呀，怎麼能把爸爸哭活呢？



## 地主逼瞎双眼 失明二十二年

爸爸死了不久，哥哥病倒，时间不长，也死了。剩下我这只孤雁该往哪儿飞呀？我拖着双脚没精打采地走着，一边走一边讨饭，后来也得了病，病倒在一个村庄的碾棚里。在病中，我越想越觉得地主可恨，要不是他逼得我们无路可走，我们怎么会流浪在这里，爸爸和哥哥怎么会死得这么悲惨。想起爸爸和哥哥，我就哭，越哭眼越不清楚，等我病好，两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瞎着两只眼，往哪去呢？只好又从口外摸了回来，到照燕洲去找我姐姐。

姐姐见我两只眼都瞎了，听说爸爸和哥哥也死了，我姐弟二人抱头大哭，我们怨苍天不睁眼，不给穷人活路；骂那个世道不公平，到处财主欺压穷人。我们哭叫着：“何年何月才能让我们翻身呐！”

平地一声雷，救穷人的共产党来了。1947年，天翻了个过，地也打了个滚。共产党领导人民闹土地改革，受穷的哥们找我赫福有去斗争捆我打我逼瞎我眼的那个姓宋的地主，这时我象见到了晴天，平生头一回知道欢喜。我和穷哥们一起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把地主斗倒了，压在我心里多少年的怒气出了，仇报了。分了好地，住上了大瓦房，开始

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，这是共产党的恩情呀！是毛主席的恩情呀！我嘴里不住地叨念：

“毛主席呀毛主席，叫我怎么感谢你老人家呢！”我跑到镇上，买来了一张毛主席像，我眼看不见，又不敢抚摸他老人家的脸，我急得说：“老天呀，那怕再叫我的眼睁开一小会儿，叫我这翻了身的人看看毛主席，我死也甘心情愿了。”

解放后不久，那时我还迷信。一个好心的人劝我到二十五里以外的景忠山去，说那山上有个眼神娘娘，向她烧香祷告，瞎了的眼就能睁开。我真的去了。烧了高香，磕了头，满高兴地走了回来。说来也巧，快到家门口了，一脚迈错，跌进一个三丈多深的井里，幸亏被开会回来的干部发现了，党支部书记王廷华把我打救上来。他对我说，神是救不了穷人的，有了共产党，你那里也别跑了。从那以后，党支部领导搞互助组，初级社，高级社，人民公社，社里把我瞎眼人的生活包了起来，我心想：共产党一来，我这受罪的人变成有福的人了。我感谢集体化，但也因为自己不能为集体出力心里过意不去，为干不了活心里难受。我想我要是有个好眼，在社里干个痛快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，保住人民的江山，该多好呀！一天，我碰到县医院的

謝彬大夫。我問：“老謝同志，你看我的眼還能治不能治？”他給我看了看說：“你这眼是‘白內障’病，可以治。”接着又抱歉地說：“可惜我們县医院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。”他的話使我产生了一种双目复明的希望。

### 双眼瞎重見光明 党的恩情难忘記

党，使我的理想变成了现实。1961年3月，迁西县医院的謝彬大夫，从唐山开滦医院学习回来，回到县医院后还没站稳脚，就跑来找我了。他又把我的眼检查了一遍，說：“福有啊，我可以給你把眼治好。”原来，从1960年，县医院就派謝彬同志去唐山开滦医院学“五官科”去了，他专门学了做“白內障”眼病的手术，在学习中，他想到了我。他起早恋晚，刻苦地学习了九个月。回来以后，就把給我动手术的打算向医院领导汇报了，医院党支部书记、院长听说要叫我这被地主逼瞎的眼重見光明，表示积极支持。县里领导、兴城人民公社和照燕洲大队的领导，听说要把一个被地主逼瞎的贫农的眼治好，也表示大力支持。我高兴极了，我想，在新社会里，我的眼睛真要重見光明了。

经过多少个深夜，医院为我动手术作好了一切

准备。迁西县医院领导上为我选了两名优秀的护士，配合谢彬大夫日夜护理，整整叫我疗养了四十九天，1962年4月8日，我出院了，我瞎了二十二年的双眼又重见了光明。我的心是多么豁然啊，我感谢医生，感谢人民政府为我花钱治病，感谢我们兴城人民公社对我的关怀，更感谢我们伟大的毛主席！回家来，我找到他老人家的画像，细细地端详起来，他老人家是那么和善，那么慈祥，看着看着，心事万端，我眼泪象一串串的珠子，从眼角滚落下来，可这泪，不是地主逼出的伤心泪，这是欢乐的眼泪啊！我按不住心头的兴奋，一夜没能安睡，我想啊想啊，越想越激动。在旧社会里狠心的地主夺去了我的双眼，在新社会里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医院，使我双眼瞎重见了天日，重见了光明。我怎么感谢党呢？我只有一心一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、为发展集体事业献出全部力量。从此以后，我天天出勤，积极劳动。如今，又被评为“五好社员”。人们都说，半路的瞎子最苦，同志，现在我愿告诉你，一个被地主逼瞎的人，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又重见光明，可是最大的幸福哩！

和和、刘毅整理

## 我的血泪家史

中共尚义县委会 吴 连

每当下班回家，我那三个孩子仰着圆乎乎的笑脸迎接着我，向我问这问那的时候，这种情景，常引起我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我们又是一个五口的人家了！”

我爱人任秀梅高小毕业，大女儿吴焕平，就要到上学的年龄了，二女儿金平六岁，三的叫子江，也三岁了，孩子们天真活泼，家庭里充满幸福欢乐。在这欢乐的同时，也常常使我回忆起我小时候那个五口人的家庭。

### (一)

我象焕平这么大那年，我家也是五口人。有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，还有一个隔山哥哥郭计忠。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平型关附近的小宅村（今为山西省灵丘县）。起初，爸爸、妈妈都给本村大地主张耀扛长活，后来爸爸因耳聋体衰，被地主赶了出

来。经过妈妈再三向地主恳求给些活干，才答应让爸爸去给他们张家看守死尸。张家地主，是个大户，他们祖上有个风俗，死了的人不能马上入葬，要明停五七或半年，才往坟地里埋，他们张家停灵的窑洞，常年不断死尸。给爸爸的工作，就是整天整夜，跟死尸同睡在一个窑洞里，闻着恶臭的气味，过着“阴间”的生活，每月挣得张家一斗谷子，租种着张家族中二亩薄地，家中三口人，就凭这，每天喝两顿连皮带谷的稀糊糊。妈妈为了混饭吃，整天住在地主家。张家地主，有十几顷地，雇着十几个长工，养着几群猪，妈妈每天要到山下河里去担水，做几十口人的饭，喂几十口猪，还要给张耀的三个老婆洗衣服，看孩子，服侍她们抽大烟。就这样日夜不闲，可是连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。哥哥郭计忠，比我们大几岁，爸爸不愿让他在地主家受罪，就叫他到外乡自己找饭吃去了。

照说，这种生活就够苦的了。到1937年，又来了日本鬼子。那年日本鬼子在平型关被八路军打败了，他们就向老百姓报复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；地主张耀全家却大抖威风，他当上了村里的保卫团长，为鬼子卖劲，任意欺侮老百姓。有一天，张耀欺侮了我妈。妈没能力

反抗，爸爸軟弱，不能為她撐腰，我們姐弟年小，也沒辦法。媽媽受侮辱，只是哭泣，一面痛罵萬惡的地主張耀，一面想，活下去吧，日後沒臉見人，死了吧，又舍不得孩子，越想心里越窄，在一天夜里，媽媽就在她住的那個小草棚子里上了吊。幸亏時間不長，被長工們發現了，大家把她解下來，急救了一陣，才把媽媽救活。活過來以後，又挨了地主的三老婆一頓苦打。媽媽遭到這樣的虐待，就下定了決心，寧肯餓死也不在地主家扛活了。從那天，她走出地主的大院，和爸爸我們一起住在放死尸的窯洞里。

在那萬惡的舊社會里，窮人真是禍不單行啊！地主張耀見我媽媽離開他家，懷恨在心。一天，他帶領一群日本鬼子，從他們家里出來，一直奔到我們住的窯洞前，爸爸吓得藏在窯洞的裂縫里，不敢出來。張耀說我們不迎接皇軍，就是私通八路軍，于是把我媽抓走了。他們把媽媽趕到一個院子里，脫掉她的衣服鞋襪，然後，弄些炭火，鋪在地上，打着她往火炭上踏，火炭燒燙着她的腳，疼得她扭動着身子亂跳亂叫，日本鬼子和張耀兩眼相望，高興得哈哈大笑。他們就拿這種慘絕人寰的罪行尋歡取樂。等我媽媽被放回來的時候，她的腳被燒爛





了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。

我媽媽在家里养伤，全家单靠看死尸掙的那斗谷子是远远不够吃了，爸爸找到地主，死說活說，又向地主借了六斗谷子。第二年夏天，老天偏偏下了一场大暴雨，我們租种的那二亩地，又被山洪冲走了。这时，地主张耀又扭动着他那身肥肉找上門来。

“吳德元！”他盛气凌人地叫着我爸爸的名字，“我那二亩地冲走了，可种子，用牲口工折的粮得还我，噢，还有那六斗谷子。”

爸爸說：“地沒了，籽种我用啥还，东家再租給我二亩，我再把看棺材的谷省下来……”

“別想那么美！看棺材也用不着你了。今天你們就从这里滚开！”

天啊，虎狼一样的地主真要逼我們到死路上去。我媽媽看到地主又要把我們从窑洞里赶出，便跪下央求：“好东家，容我們一年吧，我們要飯吃也要还东家的賬。”

这时，地主张耀不耐烦了，他說：“打开窗子說亮話吧，把亮儿給我頂債。”这时我們全家吓呆了，张耀又装出个慈善人的样子，說：“我这是看得起你們，想叫亮儿給我們老疙瘩当童养媳，一来为你頂賬，二来为亮儿不挨餓。好事嗎，哈哈！”

我們知道，地主家怎么会要穷家的女儿作媳妇呢？这只不过是句好听的话罢了。他要亮儿，是为了叫她去给他们喂猪、做饭，伺候他们；再过几年，还不是卖几个钱算了事！这时，我妈妈也假装高兴，说：“东家高待，我们领情，可亮儿才十一岁，怕伺候不好东家，等过二年，懂事了，我再送过去，反正人是东家的了。”

“人既然成我的，就由不得你。”张耀把眼一瞪，说着，一把掠过姐姐就走，妈妈哭叫着，爸爸和我也光是哭，不敢上前拦挡。姐姐被抢走了，一家人啼不成声，可有谁来劝解劝解呢！有气无处出，有仇没法报，被人打掉了牙也只好往肚子里咽，回窑洞再大哭一场吧。那知，窑洞也不让进了，狗腿子们立逼着我们离开这里。

从这天起，我们没有窑洞住，更没有粮食吃。姐姐被拉走，又听说，哥哥随着一群逃难的人走后，已经死在半路上了。全家五口人，只剩我们三口，白天沿村讨饭，夜晚睡在街上。姐姐在地主院里，只是在出门担水时才能偶尔见上一面。地主那深宅大院，是不容我们插脚的。这年冬天，下了一场大雪，冷风对我们穷人，也象地主一样的厉害。一天姐姐去小河边担水，脚上没有鞋，担着两桶水

剛登上石階，突然身子一晃，險些跌倒，回頭一看，一塊腳掌皮，沾在石頭上了，血從腳底下淌了出來。她一癱一跛地把水担了回去。地主的三老婆，見她踩得滿地是血，說她弄脏了地，又把姐姐打得滿地翻滾。媽媽聽說姐姐受這樣的罪，傷心極了。她哭了一個晚上，最後和爸爸商量，決定到口外去，聽說塢上要飯好要，可以找個半種地（種分種）的地方，如果能掙來六斗谷子，把亮兒贖回來，省得再叫她在地主家活受罪。我爸爸同意了，第二天，我們便離開了這個地主吃人的地方，向北口外走去。

## (二)

我們一路上討要着往北口外走。一年又一年，除了身上多一口“鍋”（在平型關拾的一個日本鋼盔）以外，我們什麼也沒有增加。爸爸和媽媽雖然才四十幾歲，但是已瘦得不象個樣子了。

眨眼，又是一個夏天，我們走到寶昌縣（現屬內蒙古）察布淖村附近，烈日當頭，沙土燙腳板，我肚餓口渴，一陣陣頭昏眼花，實在走不動了，就躺在道邊上。我爸爸和媽媽商量着就把我安放在路旁，兩個老人分兩路，想多要些熱飯湯給我吃。我

爸爸进村后，走到一个大院門口，滿想多要些吃的来。他登門叫了一声“大爷大奶奶……”沒有人理，他便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叫，还是沒有人理，他又往里走，一步步走到人家窗根下，这时只見里边放出一群恶狗直向他扑来，他急忙拿起打狗鞭子，一面打一面后退，退到大門口，門槛把他絆倒，一只恶狗扑来，乘机咬了一口，把腿肚子咬了个大血窟窿。我爸爸疼得大叫。这时屋里边走出个闊人来，反而大罵我爸爸：“要飯嘛，不学点規矩！咬死活該。”这时，村中来了一群人，从这些人的嘴里，爸爸才知道这家也是狠心的地主。

这里的地主恶狠，我們只好往別处走。走了一个夏天，我爸爸那条腿已烂了半截。我媽媽想姐姐，想哥哥，看着我爸爸这个可怜样，每天都要哭几場，两只好好的眼睛也哭瞎了。每天我只好一手拉着媽媽，一手扶着爸爸沿村討飯。这时我媽媽想用討飯、扛活掙点錢贖回姐姐的愿望破灭了。他說：

“天下的地主都一样狠心腸！我們死，还是死到老家去吧！”于是，我們又往老家的方向走去。

塢上的冬天，整天刮着白毛旋风，我們踏着冰雪，走到康保县的閻恼包村天黑了。衣裳破，肚內飢，冷得难熬。我們找到一个碾棚，想在那里避

风，暖暖身子，第二天再走。我們刚好坐下，一个戴緞面皮帽，穿狐皮袍子的闊人，把我們赶了出来。我們又找到一个恰好能挤下三个人的小庙，在里面弄起火来想热点飯吃，那穿狐皮袍子的闊人又赶来了，不容分說，一脚踢飞了我們那口“鍋”，罵声“滾！不走送你們乡公所！”我赶忙去追那口“鍋”。我拾回“鍋”来，媽媽跪在雪地上苦苦哀求，哀求是不会打动地主的鉄石心腸的，我扶起媽媽，继续向村外走去。村外，风卷白雪，不见天日，我們頂着风雪，胡乱地走着。走着，走着，我爸爸忽然叫了起来：“成儿呀，快来——快来——”我回头一看，他蹲在一块石头旁，抖动着两手，倒下去了。我赶到爸爸身边他已經断了气。我和媽媽抱着爸爸哭了好半天，媽媽已悲痛得泣不成声。媽媽受侮辱，姐姐被毒打，爸爸的惨死等等一連串的旧恨新仇，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，天啊！什么时候我的恨才能解？哪年哪月我的仇才能报？

1946年的4月，我們娘俩，来到了南壕塹（尚义县），这时尚义第一次解放了。一位农会主席老陈，领导穷人清算了当地的地主“黑旋风”，斗争出好多粮食衣物，他看我們娘俩衣不遮体，挨門討飯，就和穷哥們商量了一下，救济了我們每人一身

衣服，几十斤莜麦面，还有盆和碗。这时，我們娘俩以为可遇着善心的人了，跪下就磕头，惹得一群人好笑。經過大家解释，才知道老陈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派来的，领导穷人反地主闹革命的。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媽媽乐得合不上嘴。后来，我們被安置在一間房子里住下了。給孟家油坊榨油的伙伴李兴，把我介紹到那里去榨油。每天晚上，老陈都找我們去开会，我那时才懂得，要想不受穷，不受地主的剝削和压迫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的道理。于是，我参加了农会，被选为青年副队长，和穷哥儿們鬧起革命来。誰料想，好日子沒有过了多久，秋天，万恶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了，占了张家口，又往整个坝上进攻。老陈正在油坊和我們研究如何撤退的时候，敌人已經包围了我們。看情形是逃不出去了，因为我个子小，不引人注意，老陈就把文件、手枪交給我，把我推到一个山芋窖里，要我夜間逃出去找部队。老陈自己就化装成老百姓，和穷苦人在一起。夜間，老陈被敌人杀害了。我很难过，但当时的情况不容許我有半点迟疑，我把悲痛化为力量，从山芋窖里钻出来，一直往南跑，跑出一百四十多里地，在张高找到了县大队。

8月13日，我跟着部队又打了回来。这时，媽媽

已經被害死了。我逃出来后，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抓住了她，把她装进麻袋里，由房上往下滚，說“这才是穷人翻身”。媽媽就是这样被惨无人道的国民党給摔死的。地主、国民党，害得我們全家五口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这口气我不能忍受，我参加了革命部队。革命使我懂得，要报仇，不能只报个人的仇，要报全国穷苦人的仇，从那会儿，我跟着部队去打仗。

### (三)

解放以后，經過党的培养教育，我成了一个革命干部，在县里做青年团的工作，并且参加了光荣的共产党。党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，还送我到宣化干部速成中学学习了一年。我这穷孩子真象是从地獄里走上了天堂。在这幸福的生活里，我时常想起一别多年的姐姐来。她是否还活着，被地主欺侮得成什么样子了？1955年，我跟領導上提出要去找一找姐姐的要求。領導上很同情我，給我三个月的假期，借給我路費，由县公安局开了証明信，我就去找姐姐了。

我回到了家乡，听說地主随国民党逃走了，土改后穷人們翻了身，我真高兴；一打听我姐姐下

落，說是早已从地主家逃出，不知去向了。我七岁和姐姐分开，过了十八年，对她容貌一点也記不起了，但还記得她左眼下有个指头印似的黑痣。我便到处打听哪里有这样的人。一个偶然机会，听见一个大同的人說，大同市有个女警察，左眼下有个黑痣。我凭这个綫索，跑到大同。到大同听說这人随丈夫轉业到七里村。我到七里村訪問，幸运这村只有一戶姓田，我就来到田家，因为姐姐把脸上的黑痣已經医去，我俩都不敢相认。我从头至尾說明一家的遭遇，說明是来找姐姐亮儿。这时，她突然大哭起来。接着，她向我追述了她的悲惨遭遇。原来，在我們走出不足一年的时候，地主张耀就瞞着我的姐姐把她卖給了大营鎮一个盐商，身价大洋六十元，地主已經使用了。一个好心的长工把这事告訴了我姐姐，并說这个盐商是个活閻王，誰到他手也难保活命。我姐姐听了这个可怕的消息，便趁放猪的机会逃跑了。她一直往北跑，白天藏起来夜里赶路，她想找爸爸媽媽，但誰也沒有找到。有一天她餓急了，爬到一个高山上想找些野生东西吃，恰巧遇到一个山洞，有人烧香上供，她便偷些供果吃，晚上睡在洞里。这样过了半年。一天，有个小和尚也去偷吃供果，遇見了她，錯以为是妖怪。跑



了出去，第二天当地就闹重修庙宇，堵死山洞。姐姐吓跑了，跑到桑干河畔，流浪在桑干河沿上，饿了，就向过渡的人要些吃的。渡口处有个背渡行人的老汉，常给她点东西吃。一天，她见老汉背人过河，她也下去了，想渡过河去找妈妈，没料想，刚蹒到河中间，就被水冲到旋窝里，多亏这个老汉救了她，她向老汉诉说了自己的来历。这老汉叫杨发，见她可怜，就收留她作养女。后来老汉给姐姐找了一个丈夫，成了家。

我那哥哥郭计忠，原来他也还活着。1961年，我突然接到他的来信。他从平型关那里了解到我还活着，从老远来尚义看我。一起住了十几天。这十几天里，我们谈了多少往日的辛酸，有时谈着谈着就哭了起来，把眼睛都哭肿了。我们是多么痛恨过去那罪恶的社会制度啊！

#### (四)

我们全家五口，就这样死的死散的散了。可是，如今我们又是一个五口人的人家了。1956年，我在区里作团的工作的时候，从前我那个打油的师傅李兴，当了区长，他给我介绍和任秀梅结了婚，如今有了三个孩子。同志们帮我组织了新的家庭。

党培养我成了一个革命干部。我的身体不好，主要是小时受冻挨饿折磨的，加上1946年突围时跑炸了肺，曾经吐过血，没有好利落，落下了病根，有时气喘。党见我还有病，就叫我休养，给我治好了病，如今怕我过于劳累，安排我在中共尚义县委会工作。我是共产党从死里救出来的人，今天的幸福生活，都是党给我的。过去受的苦越多，越觉得今天社会的可爱，我不能忘掉这一切，我要听党的话，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。并且还要教育我的孩子们，叫他们懂得什么是苦，什么是甜；恨什么，爱什么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的后一代。

刘 锐整理

## 过去和现在

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耿长锁  
河北饶阳五公人民公社社长

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从公社开会回来，看见孩子们正围在电灯底下，一边听收音机，一边笑笑嚷嚷地包初一吃的饺子。五闺女小响见我进来，就扑到我身上说：“爹，你给俺讲讲早年间过年的事吧！嗯？”我看着孩子们的笑脸，又看看盆里剥好的猪肉馅，案上合好的白面，心想：讲讲过去，叫年青人们明白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，很有好处，就对小响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们讲讲。不过要说咱们家，得先说咱五公村。”

“七七”事变前，咱五公村是个穷村，多是薄沙地。地虽薄，地主的租子却不低。打的粮食，除了交租，自己剩不下几颗。除了高地租，地主还用大利钱剥削人。那时讲究三分利，十个月为一期，借十块，十个月后就得起还十三块，到时就还不上，利上加利，过三十个月，就得还二十块。村里的政

权，由地主、富农把持着，随便派差罚款。誰不納，就叫来衙門里的狗腿子抓进“官店”（監獄）。那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庄戶人家，被地主、富农們剝削得傾家蕩产，欺压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

咱家里曾有十亩地，因为一来納不起差錢，二来遇上了荒年，在你爷爷手里就卖出去了。从我小时候記事起，就是租人家五亩二分地种。交了租子，剩下点糠糠秕秕哪够吃？没办法，只好紡經子，打繩。打繩沒有本錢，就打手工。打手工同样受剝削：打一架子繩，手工錢只一个銅子。头明干到点灯，頂好的时候才掙二十个銅子。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不歇工，过年的时候連頓餃子也吃不上。有一年，又到了年三十，我看你爷爷、奶奶一天比一天老，奶奶还坐下了喘病，家里一点白面星儿也沒有，觉得实在对不起老人。这时街上传来“誰买白面”的吆喝声。我从抽屜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銅子，端起个簸箕就出去了。一看见放在街当心的白面担儿，我心里不由地又犹豫起来：不买吧，心里过不去；买吧，明几个吃了，后天就掀不开鍋。我围着面担儿轉了三、四圈，捏得手里的銅錢湿乎乎的，等卖白面的挑起担儿走了，我还立在那里作难。

大年初一，到头仍然起了个“紅五更”——一家人吃了頓秫秫面面条。

看看日子实在混不下去，我十八岁上，你奶奶給我打了个行李卷，打发我到城里绳鋪当工人去了。这是我头一回进城。我还記得当时的情景：护城河围着一道破破烂烂的土城牆，几个嘴里叨烟卷的巡警，弓着腰站在門口。看見闊人的小轎車，他們直起腰来立正行礼，穷人进出，褲兜子全給翻出来。我渾身上下被翻了个遍，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城。大街上，来来往往的，是挺着肚子的闊財主，和衙門里的当差的。扛脚的苦力，进城要飯的庄稼人，全得溜着牆根儿走。我心里說：“天下老鴿一般黑，城里乡里全一样呀！”

我进的绳鋪叫“协記”。东家叫董大車。这人是个双料的坏东西：是資本家，又是地主。鋪子里七、八个伙計，简直是他的奴隶：頂星星熬月亮的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，累得要死，他还找縫拿干工：晚上給他守門，早晨給他打水，麦晌大热天，他靠在房蔭凉里太师椅上搖扇子，赶着伙計們到場給他当牲口軋麦子。伙計們都觉得这董大車欺人太甚，就琢磨着跟他斗：搖經子打绳慢慢磨，上場不去，叫打水装听不見。董大車看出大家齐了心了，表面

上不說，暗里編着法找岔兒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董大車的气，就卷起鋪盖回了老家，依然紡經子、打繩，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。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国民党军队扔下大片国土逃跑了，八路军过来，咱五公村建立起抗日政权，世道才变了样。村里成立了工会、农会、妇救会和青救会。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发动群众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，印把子也夺了过来，咱家才又有了土地，紡經子、打繩生产合作社（跟現在的供銷合作社差不多）扶植，能得到合理的工錢。咱家的日子好过些了，五公村穷人的日子也都好过些了。人們抗日的心气很盛，大伙选我当工会改善部长，专门跟那些不执行政府政策的地主、富农斗争。这时候，断不了有县上、区上的干部住在咱家，他們經常給我讲革命的道理，讲共产党的主张，听了，我的心就更亮堂了。

自己有了地，就要安排着种。咱家买了两条牛腿，又陆陆续续操办着买了犁盆子、犁鐮子，预备过些时候再买个犁身安上。哪知犁身还没有买，日本鬼子就对冀中来了个“五一”大扫蕩，五公村跟别的村子一样，变成了敌占区。敌人天天出来“清剿”“扫蕩”，村里先后有四十多个人被杀害，从

西到东半截街被烧毁，你爷爷就叫鬼子杀死在村南花生地里。在这苦日月里又遇上了七个月没下透雨的大旱灾，地主、富农们企图把绳子重新套在人们脖子上——反对减租减息，还想着推翻合理负担政策。这一场浩劫，使得咱家卖了犁铧，卖了牛腿，卖了屋里炕上大大小小一切可卖的物件，卖得一家子只剩下了一床破棉花套子。糠吃完了，菜吃光了，后来就煮树皮和煮槐连豆，吃棒子核、花生皮和秫秸糠。唉，光吃这种东西怎么行啊，我病倒在炕上了。眼看你娘和你哥哥、姐姐们饿得又黄又瘦，心里酸酸的就想掉泪。光掉泪也不行啊！活动活动纺个麻经打个绳的看行不行。一下炕，腿不管事，勉强挪挪步，就象踩在棉花套子上；扶着墙慢慢走吧，还没出门口，觉得头忽悠忽悠的，眼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过了有抽锅烟的工夫，才缓过气来。

看看一家子实在没法过下去，三斗粮食打发了你大姐，你娘就拉上十三岁的德禄哥，抱着你没过周岁的捧姐，到饶阳城里一带讨饭去了。这一年，五公村有一百一十八户卖地卖庄基，二百一十三户卖衣物箱柜，三十四户妻离子散，十五人活活饿死，象咱家这样外出讨饭的户，就数不清了。

人們唱歌說：共產黨是太陽是爹娘。我覺得黨比太陽還亮，比爹娘更親。就在这父母妻兒難相顧的年月，黨的幹部、戰士，跟老百姓一樣吃樹皮、草根，省出糧食來，通過敵人嚴密的封鎖，送到群眾手里，還告訴人們：組織起來，和災荒鬥爭。那年秋後，抗日政府通過村里的“隱蔽經濟鬥爭組”

（秘密組織），發放了二千斤救濟糧，還引導人們成立起合夥組生產渡荒。咱家入了合夥組以後，大伙一塊打繩，第二年又合夥種地，不但渡過了災荒，日子還越過越好。1946年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、富農，組里人們干劲更大了。很多人看見組織起來好，也紛紛要求入組合夥。合夥組是1943年搞起來的，1951年定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，1958年又建成人民公社，到今天，已經整整二十年了。

二十年來，咱五公村已大大變了樣子。過去到過這裡的人今天重來，都會覺得驚奇：拖拉機耕地，“電井”澆水，地裡的麥子齊胸高，果園裡蘋果、蜜桃樹密密成林，一畝只收一百多斤糧食的薄沙地，這會兒已變成畝產四百八十多斤的高產田。家家不愁吃，不缺穿，只最近三年來，就蓋起新房三百多間；平均四戶就有一架收音機和耳機子，三戶就有一輛自行車。



咱家的情形，你全看见了：我和你娘全担任社里、队里的工作；你大哥德祿在发电厂当车间主任，你大姐早已离婚另找了对象，差点饿死的你四姐小捧，在城里上高中，你也是咱五公中学的学生了。早先咱们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咱，每年都要分几千斤粮食，一年到头吃粮食面，每到过年，都能吃上白面饺子了。

咱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？咱五公村的变化是怎么来的？是党的英明的领导。从办合伙组那天起，党就从各方面领导和扶助咱们，引导咱们走上了康庄大道。你们要紧紧地记着：要不是共产党，不是新社会，咱这穷五公村的穷人，是不会有今天这好日子过的啊！

克 明整理

## 团 聚

丰润县中学 王淑兰

刚放暑假，就收到爷爷来的一封信，叫我们全家到老家黑山沟去团圆团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们的老家就在火石营，为什么又出来个老家？我问爸爸，爸爸好象是心事重重，没有很好地回答我，只是说：“是呀，那才是真正的老家。”

我们来到黑山沟，呵，我们这个老家人可不少啊！老少三辈，二十二口子人欢聚一堂，好不热闹。光大伯他们那屋，就有六个姐妹，老叔王成如那屋，有两个姐妹。加上我，我们姐妹十来个，素不相识，今日团聚一起，说呀，笑呀，笑呀，说呀，话头总是扯不完。不用说，爸爸、伯父、叔叔，妈妈、大娘、婶子他们也是这样。这个团聚会地点，是在伯父家里，他们的房子背靠山坡，是一所新盖的五间大瓦房，安的是玻璃窗子，屋子里亮堂堂。房前有块坎阶，作为庭院，院子的西边，有一眼水井，井台旁有一个高高的葡萄架，遮着蔭

凉，老年人們在屋子里說話，我們在葡萄架下唱歌、說笑。中午，爷爷叫我們吃了团圓飯，这頓飯是伯父筹备的，他為我們杀了一口猪，碾了粳米，米飯燉肉，爷爷当年給地主当过厨師，他特意給我們做了几个菜，还预备了好些烧酒。我們姐妹十来个都不喝酒，吃完了飯，就坐在井台上玩了起来，有的說自己在哪里上中学，有的談在哪里上高小，有的讲自己如何喜欢美术，有的叙自己怎样爱好音乐、歌舞……談論得正熱鬧的时候，爷爷带着一股酒味，湊到我們跟前来了。他往埧阶上一坐，抖着胡子，仰着紅通通的笑臉，對我們說：“你們鬧的这么欢，托毛主席的福哇！”

“是呀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，就是幸福！”三姐抢先回答着爷爷。我也附和着說：“毛泽东时代的青年，是幸福青年嘛！”

爷爷說：“你們光知道幸福，幸福，可你們知道咱家为什么分得七零八落嗎？”說着就冲着我，

“我就問你吧，淑兰，你爹怎么到火石营去的？你老叔又怎么到黄花港去的？今天又怎么团圓的？你給我說說。”这一連串的問題，把我們都問怔了。我說不上来，別人也干瞪眼儿。憋了一会儿，我說：

“我們都不知道，爷爷，还是您給我們讲讲吧！”

爷爷答应了我们的请求，他给我们讲了一段辛酸的往事。

在从前，爷爷一亩地也没有，全家七口人，只靠爷爷给南街地主李三瞎子扛活做饭，伯父给他家放羊，挣得几个钱，来养着奶奶、父亲、叔叔，还有两个姑姑。全家七口人吃饭，靠爷爷扛活养不起，后来又向地主李三瞎子说了些好话，从他手租了三亩地。从此，爷爷天天起五更睡半夜、顶星星熬月亮地精心整理这三亩地，想叫地里多打点粮食，把全家的生活搞得好些。可是，地主租给爷爷的那三亩地土薄地荒，要想多打粮食，得多施肥，把土层垫厚，才能长庄稼。爷爷、奶奶贪黑起早，干了两年，数不清往地里背了多少筐粪土。俗话说：地不亏人，第三年，真的得了一个好收成。可是，地主看着这三亩地变肥了，就把地收回去了。这地一收回不要紧，奶奶心疼坏了，费二、三年力气，刚使地能长庄稼了，就给收回去，这不是成心克人吗？一阵发火，得了个“暴火眼”，接着忧心愁愁，又得了重病，就躺倒在炕上了。那时候伯父才十一岁，年小体弱，每天给李三瞎子放羊，大清早就赶羊上山，天黑才回来，东家一不顺心，不是脚踢就

是鞭抽。他人小，放羊却是很精心的。一天，伯父放羊回来，天已很晚了。因为心里惦着病在炕上的媽媽，便紧赶羊群，往回跑。回到东家大院，把羊赶进圈里，刚要吃饭；地主到羊圈里一数羊，少了一只，李三瞎子不由分说，先给伯父两鞭子，然后问：“我那只小绵羊哪去了？”伯父说不知道，李三瞎子急红了眼，拿起皮鞭，又是一阵毒打，把伯父打得遍身是血，伯父磕头求饶，那能打动地主的心！地主知道，叫伯父赔羊是赔不起的，只有用鞭子解恨。地主把伯父打昏了，便一脚踢出门外，关上了大门。

伯父躺在门外，被乡亲们看见，给抬到家里，过了好长时辰，才苏醒过来。奶奶看到孩子被地主打得皮开肉绽，又心疼又生气。这一气，病上加病，没过三天，就死了。

爷爷在地主家做饭，原来听说地主打了儿子，心里虽然难过，痛恨地主的残忍，但表面上还得堆着笑脸，给地主赔不是，说：“孩子不懂事，丢了你的羊，该打！该打！”爷爷说这些昧良心的话，不是为别的，都为的讨好地主，求得不把伯父解雇，能混住饭碗。但就是这样忍着心疼讨好地主，也没有换得地主的半点仁慈。当狠心的地主一脚把

伯父踢出，奶奶又因气致死以后，爷爷急了，他一变过去遇事央告地主的做法，开始向东家辩理。可是，在那种社会里，财主无理十分对，穷人有理错十分，爷爷辩理的结果，也是落个解雇回家，丢掉了饭碗。

发生这件事情那年，正是清光绪二十六年。那年是特大的灾荒年。奶奶死了，爷爷、伯父都被解雇回家，全家老小六口，地无一垄，更没有产业可折卖，吃什么呢？只好到地里去找野草野菜。一家子整整四五十天没见粮食粒儿，把人饿得皮包着骨头，不象个人样了。

财主家吃肉，穷人吃草，就是吃草也还要受地主的气。一天，爸爸去采野菜，可野菜也是长在地主的土地上的啊！李三瞎子看见爸爸在他的地上采野菜，就追了上来，把烂眼边子一翻，向爸爸大骂：

“滚出去，穷崽子安的什么心，大灾荒年来踩三爷的庄稼，不滚开我扔你山沟子里，叫狼掏了你。”爸爸那时才六岁，被地主这一骂，吓得连哭带叫跑回家来。爷爷看这家子人没法活下去了，就下了狠心，把两个姑姑给了人，又经隔壁二爷出了个主意，托人情，把爸爸卖给了火石营村的王家，把老叔卖给了黄花港一个资本家。只求让幼小的孩子有

个活命，顾不上父子之情了。

爷爷卖了两个儿子和两个闺女，生活仍是没办法，只好领着伯父，到处去讨饭。

老叔卖给资本家以后，一天天长大了，人家拿他当奴隶使唤。一不合主人的意愿，就要挨打受骂。冬天，老叔没有棉鞋穿，脚冻得化脓流水，还得给人家干活儿。十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光着脚怎么受得了呢？一天早晨，老叔冻得实在不能忍受了，他趁伙夫不在灶旁，就去烤脚。正巧被资本家的太太看见了，她大发雷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狗崽子，不去干活到这儿来烤脚，来，我叫你烤个够！”说着，把老叔的脚塞到火里。老叔的脚本来就已冻坏了，又经这一烧，就烂开了。每天夜里，疼得他泪珠滚滚，不能睡觉。可是天一亮，他还得给人家照样去干活。

父亲被卖到火石营，名义上是当亲儿子看待，其实那个老太婆对他狠极了，连饭也不管饱。一年春节，家里蒸了好些饽饽，却不给他吃一个，他饿得没办法，偷吃了两个，被罚了四天不许吃饭……是旧社会，是地主逼得我们全家七零八落，逼得我们到处受折磨。

爷爷讲的故事，我們的确沒听說过；我們听說的，看到的，都是幸福和欢乐。共产党毛主席領導全国人民鬧革命，大地就象平地一声雷，到处都是幸福的美景。

是啊，共产党一来，爷爷和伯父不要飯了，他們分得土地和房屋。我們在火石营也分了十六亩地，老叔也被贖了回来，結了婚，搬回黑山沟。我們在火石营，以前跟爷爷没有什么联系，从1950年，爷爷找到了我們，亲人相見，不再是痛哭流涕，相談的光是新生活。比如我們家吧，从1953年入互助組以来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建立人民公社，我們这山沟也安上了电灯。吃穿不用說，从文化生活上讲，我們姐弟四个，都上学了，我在念高中，弟弟初中毕业，在生产队当了記工員，爸爸这五十几岁的庄稼汉，在村里看电磨，由农民变成了电机碾米工人。我上中学，离家远，往返不方便，家里就花二百六十多元买了一辆自行車，让我騎着来来去去。这个穷山沟，如今不但吃穿富裕，手下还有存款。我伯父、老叔他們家的生活更好些，他們家还买了收音机。

現在，我們的生活和爷爷过去的的生活相比，真是从地獄变成了天堂。在这幸福的今天，爷爷为什



么叫我们来团聚团聚呢？为什么给我们讲全家过去这段故事呢？我懂了，他老人家，看到我们这么欢乐，个个无忧无虑，大约是怕我们不了解过去血泪斑斑的家史，将来出什么岔子。这个团聚是有意义的，它教育我们青年的一代，要好好地学习，好好地劳动，记住阶级仇恨，提高警惕，始终跟着共产党走，为保卫社会主义战斗不息。当我们向爷爷这样表示态度的时候，他满意地笑了。

刘 锐整理

## 永远不能忘本

天津港务局客运站 高玉志

“永远不能忘本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！”

这是我的母亲刘副琴在1956年1月18日临死时对我的遗嘱。那一天，她把我叫到身边，神情严肃、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不要忘记，旧社会把我们一家八口，逼得生离死别，卖儿丢女，只剩下了四口，新社会却使我们拆散的骨肉，又团聚在一起。孩子呀，你不能忘本……”

母亲在世时，也常对我们和街坊邻居谈起一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一次两次，十次八次，从来不嫌絮烦。当时我想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何必老要念叨呢？再说，卖儿要饭的事，有什么可多谈的。现在想来，我的想法是错了，母亲的想法是对的。总是她老人家比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要多些，对阶级压迫的体会要深刻些，才在经历了一生悲欢离合的生活终点上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

我要永远跟着党走，我就不能忘本，让我再回忆一次过去的生活，来纪念我辛劳一生的母亲。

我的老家在天津郊区葛沽大高庄。当时一家七口，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（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），全靠着爸爸打短工或摸鱼虾来维持生活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1939年发大水，房塌屋倒，一家老小，只好和灾民们一起逃进葛沽镇，挤在破庙里躲避风雨。

天灾还没有挡过去，人祸接着跟上来了。日本鬼子亮着刺刀在葛沽镇抓“劳工”，不幸把我爸爸也抓走了。当时兄弟几个，我是老大，也只有十一岁，全家人靠谁劳动呀！妈妈看着老的老小的小，愁得走投无路。她好几次领着我们到村口的河旁去转游。我问她老在这里转游什么，她就泪流满面，说不出话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打算带着全家人投河。可是到了河边，看看大的，再看看小的，下不了这种狠心，还想出一口气，不能这样窝窝囊囊地死去。

爸爸被抓走后，一直没有音讯，奶奶连饿带惊就病倒了。妈妈为了救奶奶，又想给孩子们一条活路，万般无奈，把还只有三岁的小弟全顺，卖给了人家。小弟被人家领走后，妈妈端起碗来就哭。就是这样，奶奶的病也没有好，没钱请医服药，凄凄

凉凉死在破庙里了。

那时候，葛沽鎮象我們这样的难民多得很哪，大家挤在一起，哪有活路！媽媽不得已才离乡背井，領着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流浪到天津市里，在河西区謙德庄一带挨門求乞。沒过几天，忽然有一个妇女，怜悯起我們来了。她給我們一点錢，又說要給我們找活干。这简直是个“大善人”，媽媽感激得不知怎样好了。誰知到了第二天，那个“善心”的女人，忽然露出凶相，带着几个打手，生夺硬抢，把我妹妹带走了。天呀，象我們这样穷要飯的，到哪儿去叫冤，到哪儿去喊屈？媽媽带着我們在謙德庄一带轉来轉去，希望能够再看一眼我妹妹的影子。但是，这只是一个梦想了。

那时候，天津这地方，連要飯也呆不下去了。我們又流落到塘沽，仍然依靠要飯糊口。想不到第二年，爸爸从东北牡丹江逃回来了，他找到了我們，一家人又喜又悲。不久，爸爸在碼头上当了“散工”，卖苦力，换些糠糠菜菜，搭了个窝鋪，总算結束了一家的流浪生活。可是，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呀！沒过两年，新添了一个妹妹后，爸爸因劳累过度，又病倒了。平时干一天吃一天，一天不干就一天揭不开鍋，哪来的錢請医吃葯呀！媽媽整天发愁，也

无法給爸爸治病，只好眼看着他痛苦含恨地死去。

沒有几年，我們一家八口，死了两口，賣了一口，被搶走一口，就只剩下四口了。

我还未到十六岁，就不得不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。后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，国民党軍隊盘踞在塘沽。我好容易在碼頭上排了号，当上一名“散工”。碼頭上多的是大小把头，有些把头是專門榨童工的血汗的。他們起早就把我們赶到碼頭上，象成年工一样装卸貨物。到了傍晚，他們又出了“鬼招”，把一批批重活分配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工，餓了一天，干了一天，肩背上还扛得起那些一二百斤的大包貨物嗎？好，扛不动，就刷下来，回家去吧！要錢，把头一揮手說：“不給。这是規矩，誰叫你干不了！”就这样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天，有时还是空着手回家。

到了1948年，在碼頭上也混不下去了。媽媽和弟弟、妹妹拾破烂，拣煤核，無論如何也填不飽肚子，我只好鋌而走險，“飞車偷煤”，成了被反动派罵的“煤狗子”。这煤可真是不好“偷”呀！火車在飞跑，你就要冒着被車輪輾死的危險，爬上車去，弄下点煤来。跳上了車子，那国民党頑軍的枪口就开始朝你瞄准了，枪弹嗖嗖地射了过来，誰能

保险不从自己身上穿个窟窿？当时在塘沽一带走这条路的人成百上千，而被国民党頑軍用枪打死的，或者被火車軋死軋断大腿的，也經常不断地发生。我的邻居小哥俩，就是一个被軋死，一个被軋断了两条腿的。即使是这样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得来的煤，还有地痞流氓、伪警察等要从中剝削你很大一部分。我走了这条路，媽媽說：“你是一只脚在棺材里面，一只脚在棺材外面；我是一颗心，早被撕成了两半。”如果，不是1949年获得解放，我們高家眼看又要少一口人。

.....

旧社会逼得我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。

旧社会逼得我家顛沛流离，走投无路。

可是，苦根在什么地方呢？刚解放时，我也只有二十挂零，对过去的悲惨遭遇，还是挖不着根。

解放后不久，我和二弟玉忠，很快找到了工作，我在塘沽碼头上，成了正式的装卸工人，不，成了真正的工人階級中的一員！

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的一天，在我家住的西邻村附近，看見了一帮人抢着买当天的报纸，还嚷嚷着：“看看上面有沒有好消息！”他們所說的“好消息”，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是不是在东北

扔炸弹。这帮人中有一个叫馮連元的，他是过去榨“煤狗子”血的流氓头子。当时我很納悶，为什么解放了，他們还盼着美国鬼子在中国人民头上扔炸弹？我回家后把这事和媽媽一說，媽媽就警覺起来：“孩子，这帮人解放前逼得我們无路可走，解放后还要指望我們过倒霉的日子，我們和他們是死对头。”接着我又把这些情况和派出所的同志們說了，在同志們的启发下，我才明白了这就是階級斗争，过去我們的苦，就是这帮地主、资本家、地痞流氓等剝削階級所造成的。

挖到了苦根，我就恨透了这帮人。我們一家人都投入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階級斗争。有时候，母亲在村里了解情况，我就在外面搜集材料，終于帮助了公安部門破获了几件反革命的案子，把馮連元也逮捕起来鎮压了。

媽媽十分自觉地成了街道积极分子，旧社会的“叫花婆子”，終于在一場場尖銳的階級斗争中，在一次次运动中，获得治安、卫生、拥軍等五个模范称号，成了区人民代表，市人民代表。在1953年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我在党的教导下，也于1955年入了党，并且由一个装卸工人，成了現在天津港务局客运站的党支部書記。

我們的家庭有了意想不到的显著的变化，但是媽媽还是常常要念叨过去的苦难遭遇。她說，不想想过去的事，怎么能恨透象馮連元这样的階級敌人，怎么能感到新的生活的甜。想起过去，我們常常要念叨在1939年卖走的小弟和被抢走的妹妹。

1954年1月18日，媽媽正在家中养病，看見进来个年輕的妇女，媽媽以为是区里的妇联会干部来了解情况。誰料想这个“妇联干部”竟扑到媽媽怀里，流出了欢乐的眼泪，叫起了媽。这正是我失散十几年的妹妹玉强。

原来那年她被人抢走后，就被卖给住在河西区的一个姓臧的日本翻譯。名义上是养女，实际上是倒屎倒尿，做飯洗衣的小老媽子。到了临解放前一年，这个坏蛋看到妹妹已經长大，逼她在工厂里做工，却拿走她的全部工資。如果，晚解放一年，她势必要受到更大的折磨。解放后，妹妹的觉悟提高得很快，在1949年就入了党，后来又在区委会当干部。她經常怀念着失落十几年的母亲和家人，她托組織和有关的干部給打听我一家人的消息，后来就在葛沽大高庄的党支部書記的具体帮助下，找到了我們。現在她是和平服装社的党支部書記。

拆散十几年的骨肉，在新社会中又团聚了，媽



媽当然十分高兴。可是，她有时还是念念不忘旧日的痛苦。她的身体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，落下很多疾病，到了1954年，肾脏炎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都接連而来。住了一回医院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，終算暂时治好了。1956年1月，旧病复发，領導上設法請最好的医生給她治病，用最好的藥，区、市領導干部还亲自来看望她。新旧对比，使她常常和我們談起奶奶和爸爸是怎样死的。到她經過百般抢救无效，就要死去的时候，还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喊着：

“永远不能忘本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！”

媽媽死后，我們根据她的遺訓，把全家要飯时的一条破被子和一条破毯子，好好保留下来，作为“传家宝”。

这几年来，我家的生活一直在上升着，我也結了婚。1962年，那个在1939年离开我們的小弟全順，也找到我們了，他在葛沽公社当社員，还是个民兵队长。可是，在欢乐的生活中，我偏偏沒有很好地遵守母亲的遺訓，不常談起过去的痛苦遭遇，以至使我的小小妹妹走了一段弯路。

我的小小妹妹今年（1963年）才二十一岁，解放时候才七岁。她可說是生在苦蔓上，长在甜蔓上，



該上学的时候上学，生活里充滿欢乐，只知甜，不知苦。我也覺得她生下一岁沒了爹，十四岁沒了娘，就不想使她在生活上“受屈”，因此十分迁就

她。正因为对她放松进行阶级教育，结果使她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沾染上胡吃乱花的行为，盲目地跟一些讲究享受的人们看齐，甚至犯了错误。后来她在党、团组织 and 我们的帮助下，改正了错误，并且走上了支援农业的劳动岗位。

妹妹的错误，曾经使我痛苦，可是找不到一个答案。后来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以后，才进一步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阶级斗争，妹妹这么一个苦出身的孩子，居然也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。我痛定思痛，问我妹妹：“难道你就忘了妈妈抱着你要饭了吗？”她哭着说：“这些我并不知道。”真的，临解放她才七岁，她知道得太少了。这时候，我猛然意识到妈妈在世的时候，总向人们讲述过去的痛苦遭遇实在是太必要了。正是因为我对妹妹放松了这样的阶级教育，没有给她补上这必要的一课，才使她走上了错路。这一个教训，促使我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母亲的遗嘱，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过去的痛苦生活，时时刻刻不能放松自觉的思想改造，同时我也要把自己生活道路上的经历告诉大家。让我们更加痛恨旧社会，更加热爱新社会，热爱党，坚定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。

谢 清整理

## 血 泪 童 年

寿王坟煤矿工人 刘长海

我的童年沒有欢乐，沒有温暖。

記得母亲病死那年我刚五岁，弟弟才两岁。那是个多么悲惨的时刻啊！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，财主家杀猪宰羊鞭炮齐鳴；我們穷人家不求吃喝也要討个吉利：还上财主的债，买上两张打鬼的門神。就这样，爸爸含着眼泪扔下奄奄一息的媽媽，还是給财主干活去了。可是万万沒想到：到晚上他回来时，小弟弟抱住媽媽那冰冷的乳房嚎着要奶吃；我連冻带餓貼着媽媽的脸儿早已昏过去了。当爸爸用呵气把我暖醒，用一碗热水把小弟弟喂飽后，我們又围住媽媽大哭了一場。光哭有什么用呢？

爸爸找出全家唯一的一床破被拆了，求邻居給媽媽縫了件衣服；爷爷又向地主去求情，想借錢給媽买口棺材，可是狠心的地主說什么也不肯，只借給了几块朽木板。媽媽就这样冻餓一生，离开了人間。

媽媽死后，我們父子三人好几天粒米沒下肚，

躺倒在炕上。这时财主李相林骂骂咧咧地来了，一进门就冲着爸爸：“你为什么好几天不上工啊？”爸爸說：“我屋里人死了。”灭絕人性的地主却說什么：“一个臭娘們死了就死了唄！……如果你还不干活，可別怪我不客气，那就滾出我的大門，还我的棺材板。”

“好！”爸爸憤怒得眼珠都要瞪出来了，多么不容易迸出这一个字啊！他亲了亲弟弟，又亲了亲我。不一会儿，只見奶奶来抱走了小弟弟，我跟着大伯到他家去了。

天下受苦人一样穷。奶奶也沒办法养活小弟弟，就把他送给了邻居张富家，不久，张富夫妇相继死去，听說弟弟又被送人了。我，在大伯家整整住了两个春冬。苦难的生活，使我过早就变成了大人。有一天，我跟爸爸說：“爸爸，我今年都八岁了，有錢人家的孩子念书，我能看猪。”不知爸爸是欢喜，还是难过？他两眼是泪，嘴上挂着苦笑，說：“孩子，咱哪有猪啊？”“給老馬家看猪。”

“不，他是财主，看不好，要挨打受罵的呀！”爸爸說什么也舍不得放我出去。可是有一天，我正在河套割草，却被馬财主給抓住了。他把我騙到他家，指着我的鼻子喝道：“告訴你，你家祖祖輩輩

欠我的债，从今天起，你就要给我放猪还债，放不好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我吓得魂儿都飞了，三步两步地跑回家来，对爸爸一說，爸爸一头栽倒在地，半天才苏醒过来。从此，我开始了血泪生活的第一課。馬財主家共有大小猪只三十多口，一个八岁的孩子，要照看好这么多欢蹦乱跳的小东西，多么不容易！一天，我正在河边洗脚，小猪仨一群俩一伙地打滚、拱食，可是哪曾想，跑来了几只餓狼，它們象老鹰抱小鸡一样扛起小猪就跑，我在后边破命地吆喊号叫，唉，有什么用呢？到晚上，馬財主一点数不对，不容分說，就用木棍子劈头盖脸打起我来，打完，“噹啷”一声关上大門，把我推出門来了。

爸爸把我領回他的身边，象母鸡用大翅膀掩盖小鸡一样保护着我。可是穷人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掌握啊！我十一岁上，又被財主狗腿子吉猷中抓了去，叫他放羊。羊从此又成了我亲密的伙伴。白天，高山深谷里，它們陪我采野果充飢，夜晚，它們用毛皮为我温暖着身子。爸爸不放心我，有时帶我到他的馬棚子去过夜；有时給我留下一点点可怜的糠窝窝。十一岁的孩子，正是跑跑颠颠能吃能喝的时候，可是我只能啃上拳头大的一块豆餅，常常



是爬爬山就天旋地轉；走着走着就两眼冒黑星。那是一个大风狂吼的一天，我赶着三十多只羊，刚刚爬上半山腰，一个趔趄，一头冷汗，就再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当我醒过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滚坡了。羊儿在头顶上咩咩乱叫，我勉强攀了上去：“天哪，怎么少六只小羊呢？”我左数右数，一遍又是一遍，到底缺了六只，“平时羊吃不饱，我还要挨打；这次羊丢了挨打是小事，叫我赔可怎么办呢？”我吓得双手捧住脸，双脚跺着地号叫天，苍天不应；我爹呀妈呀，一声一声呼唤，回答的只有那松涛呜呜，山谷回响……天已近黄昏，找不到羊，我只好拖着血淋淋的两脚，硬着头皮来见东家奶奶：“丢了六只羊。”“怎么？”她一句话没说完，拿起大棒子就向我扑来，我没让她打着，说了声：“我去给你找。”转身就往山里跑，满天繁星眨着凄凉的眼睛，山涧小溪发出悲切的呜咽，这一切一切都好象同情我这个弱小无助的孩子，可是财主家啊，你为什么就那么狠心！我学羊咩，嗓子都喊破了，还抵不上你的羊值钱？我学羊跑，两腿都转筋了，还劳你的家丁来捉拿我？……这时，我不知为什么，胆子大了起来，索性蹲在树丛里不出去了。我清楚地听到财主一帮人马绕山大骂：“小兔崽子，今天



我抓住你，就要你的命！”为了那六只该杀的猴羊，我整整在山里蹲了四天四宿。后来，实在饿的挺不住了，才翻山越岭来到姥姥家。当姥姥看到我满身血痕，知道我受了委屈，象揪了他的心一样，哭的那么伤心。后来又偷偷托人给我爸爸捎个口信。谁知道，万恶的财主耳朵比兔子还长，他听说我没有死，立逼着爸爸带我去见他，我心想：反正羊被你们找到了，要见就见。我一进门，东家奶奶就举起了血手，到底用荆条子把我抽得浑身冒血，她才算消了气。这一次毒打，我整整有十多天不能起炕，爸爸忍着泪，一口水一匙汤的将养着我……

穷人什么时候才能见天日？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？莫非我们祖祖辈辈就该永远受苦受难吗？一天，爸爸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咱们在这黄土坎子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天没咱们一角，地没咱们一块，咱们走吧！”“走？往哪去，爸爸！”“往哪去？”爸爸也茫然了。但又一想到眼前的这非人的生活，爸爸还是心一横，脚一跺：“到处为家，走哪算哪。”就这样，爸爸背着我掩上了破马栅子，提着全家唯有的一份祖产——一个黑瓦罐、一根打狗棒。我们爷俩刚刚出了村口，天哪，财主的狗腿子追来了，他逼着爸爸转回去，说这是“负债潜逃”，假如

告到官府，爸爸不但要受刑罰，还得花錢吃官司。……这一次，財主也要开花招了，他見爸爸沒有动怒，却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老刘呀，眼下就要过年了，往哪走啊！这麼的吧，我这有二升小米先借給你……”爸爸本想不借这“要命的米”，可是又一想到我，他还是拿回家来了。“年好过，节好过，日子不好过呀！”我們爷俩刚吃完了两頓年干飯，爸爸却被拉去給套上了枷板；我也不得不出去給財主放牲口。

不久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我們穷人奔走相告，以为这回該見天日了呢！唉，赶走了鬼子又来了遭殃軍，遭殃軍来了穷人更遭殃。挖工事、修地堡，抓丁、抢粮……年迈的爷爷活活被他們給折磨死了。不到一个月，爸爸也因劳累过度，一病未起与世长辞了。

我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可怎么度过以后艰苦漫长的岁月啊！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流的眼泪成河；我倒的苦水成車，可是有誰同情我？懂得我？我去找財主算賬，財主拨拨鉄算盘，說什么我就是再給他干一輩子，也还不清祖輩欠下他的“閻王債”！我要向他借錢給爸爸买棺材，他又說什么。“你媽你爷爷的棺材板沒还完，你再来张手借！”……

爸爸，难道你真就这样死无安身之处？就这样白白劳困一生？我抚着爸爸的尸体嚎啕大哭……到底还是穷人护穷人啊。有一个伯伯自动把自家唯一的一口小柜拿出来钉成棺材，这才把爸爸埋葬了。

爸爸死后，一家的债务都压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。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尽管那时我还不到十二岁。我早晚给财主家做零活，白天跟成年人一样扛活。农闲季节来了，我又要去放猪放羊，十冬腊月光着脚板跑山，两只脚不知脱了多少层皮，老皮脱落后露出嫩肉，都不敢沾地啊！就这样度过了两个艰难的冬天。

难忘的幸福时刻终于来到了。1947年3月，围场解放了。我和乡亲们一样得救了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很多革命道理；我也懂得了革命的道路尚长。所以，转业以后，我就积极参加了高级社、人民公社。我并且主动提出要担任放牧员的工作，全队大小八十多口牲口，在我放牧的三年里，没有一头闹毛病的，它们都长得滚瓜肥胖。有的人问我：“长海，你放牲口为啥那么经心呀？”我说：“过去我给地主放牲口，那是强迫我干的；今天我给咱自己放牲口，如不经心，对得起谁？”

1959年11月，响应党支援工业建设的号召，我被调来铜矿工作。最初，分配我在井下做毛工，有时车皮少，我就帮助倒掌子、装车，干一些零活，呆着总觉得对不起国家。有时看到工友们不爱护工具，我就心疼，想起过去给地主放羊时，一次，因没小心碰倒了他的水桶，就挨了一顿打。今天我们使用的是人民的、国家的财产，就这么大手大脚，可太败家了。所以，每当下班后，我就爱修理个破耙耩子啦，收拾个坏铁簸箕啦……其实，这都是应做的事，可是却得到了领导的表扬。

后来，领导又分配我做送火药工作，说这活累些。我心想：再累也比给地主当牛马轻的多。所以，我毫不犹疑地答应了。1962年又调我做电耙加油工，在工作中我非常注意节约，哪怕一滴油，我也不叫它损失，有的工友看我抠抠索索，说我“小气”，我心想：黄油一元多钱一斤，比人吃的油还贵。在旧社会我们全家老小，几十年没见过一滴油，而今天顿顿吃饭不离油。为什么对吃的油那么看在眼里，而对机器油就不在意？机器缺油不能转动，要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！就这样，一年来，我给国家节约了黄油二百多公斤。

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我由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一

个社员、一个矿工、一个先进生产者、一个共产党员，这一切一切完全是党、是新社会给我的啊！我不能忘本，更不能忘记阶级苦，忆苦思甜。我要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、毛主席的好战士！

李金岭，于义全整理

## 流浪儿的新生

唐山市織染厂工人 李維国

我每次走在唐山市的街道上，看到一个个欢蹦乱跳的紅領巾在面前閃过时，总是投出羨慕的眼光。我对他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：贊美他們的現在，更千百倍地贊美他們的未来。可是，我看着孩子們这幸福的情景，在欢快的同时，也不免有一股心酸涌上心头：就是在他們游玩的街道上，解放前有多少孤儿流浪乞討，受着折磨啊！在这些孤儿群里就有我。

我的家在丰南县大新庄子，九岁（1943年）那年，正是日本鬼子統治的年代，爸爸被貧困的生活逼死了，媽媽帶着我和七岁的弟弟，一路要飯到唐山。那个时候的唐山，表面看起来挺熱鬧，大商号一家挨一家，卖啥的都有，可就是出入买卖家的多是肥头大耳的闊人，花花綠綠的小姐，見不到象我們这样穿着破烂衣服的人。每当經過这里，媽媽总是这样告訴我：

“孩子，那不是我們进去的地方！”

媽媽找不到事做，我們娘仨只好流浪在街頭，要些稀粥酸湯充飢。媽媽看我們餓得不象个人样，要來点还要把稠的撈給我和弟弟，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，她呢？剩下一点稀湯淡水，就喝两口，來糊弄糊弄肚子。就这样，一天天的熬下去，媽媽瘦得更象样了。

我永远也不会忘記那一年的中秋节，有錢的人家都备齐鮮貨、点心、魚肉，过团圓节。可我們母子三人，一天啥也沒要着，餓着肚子睡在一道大牆根下。半夜下起了雨，雨把我澆醒，我去推媽媽：

“媽，下雨了！”“媽，下雨了！”連叫几声，媽也不吭一声。这时弟弟也醒了，和我一块儿叫，媽媽还是不說話。弟弟爬到媽媽的身上，去亲媽媽的脸，媽媽还是不吭声。我去摸媽媽的手，手冰凉，身上都硬梆梆的了。我失声地叫起来：“媽媽死了！”我抱着媽媽的脖子，弟弟搂着媽媽的腿，一边摇晃一边哭。弟弟哭得睜不开眼，搂着媽媽不放，以为媽媽还会活过来，再領着我們去要飯。可是媽媽死了，我們到哪去呢？想到这里我們哭得更厉害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对面走来两个歪戴帽子的警察，腰里掖着手枪，两手叉着腰，大声叱責我們：

“哭啥，死了喂狗！再哭，崩了你們！滾蛋！”

說着就用腳踢我們，我和弟弟當時又難受又害怕，不敢哭出聲來，象傻子一般守着媽媽的屍體呆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還是附近的窮苦人家給找來了幾塊破席頭和幾條舊繩子，幫着把媽媽埋在了亂葬崗子上。

就剩下我和弟弟了，我帶着弟弟到有錢人家去要飯，他們不給，還放出狗來咬我們。我倆沒法，就只好到大街上，揀些柿子皮、梨核來吃。天氣漸漸冷了，身上沒有棉衣，單衣也都成了布條條，一到夜里凍得身子亂顫。為了不被凍死，只好躺在飯館外面的灶坑里睡覺，有時被掌櫃的看見，還被踢起來擡走。我倆流浪到廣東街時，一個開漆工人看我們實在可憐，怕把我弟弟凍死，就把他帶走撫養了。一家人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就剩下我自己了。流浪兒生活把我折磨得鬼不象鬼，人不象人，警察和闊人嫌我臭、嫌我脏，過來過去不是腳踢就是用文明棍打，我簡直成了挨打的疙瘩。

一天夜里，我們一群流浪兒正睡在大世界的商店外邊的木頭案子上，一陣腳踢和叫罵聲，把我們從睡夢中惊醒，一把把刺刀對准了我們的胸膛，我們被綁了起來，帶到了日本的警備隊。鬼子硬說是



坏人，将我們吊起来，皮鞭沾凉水，輪流着打我們，整整挨了一星期打，才把我們放出来。我两腿被打得不能走路了，幸而有沒被抓进去的流浪儿，要一些菜湯和馱飯匀点給我吃，总算沒有餓死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，才算能够动弹了。我恨死了这个人間地獄的旧社会，和这群吃人的恶魔，可我只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
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各个买卖家都挂上了大旗，敲鑼打鼓，說是庆祝胜利，我当时高兴得流着泪告訴伙伴們：

“你們听着，我們該有飯吃了。”

同伴們也都高兴得互相抱着，摔起跤来。

可是沒想到就在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，我們又被国民党警察抓去了，鎖在国民市政府旁边的一間小黑屋里，每天只給一些酸湯喝，餓得我們連头都抬不起来了。一天夜里，把我們五花大綁，装上了小火車，車上放着席子和鍬鎬，我們以为拉出去活埋，誰知道車开到古冶，我們就被警察从火車上連踢帶推抛下来，有的把胳膊摔坏了，有的把腿跌伤了，只听警察厉声訓斥：“再到唐山去，要你們的小命。”

我們不敢动弹，在野地里呆了一宿。第二天一

商量，在古冶更不能糊口，就是死也还得奔唐山，我們一伙你搀我，我扶你，步行了五十多里地，又到了唐山。到唐山不久，一个夜里，我們亲眼見到，从大世界那一个地方就拉出八、九条死尸去了，这都是被折磨死的穷苦流浪人。

几年的流浪生活，使我認識到了旧社会的残暴和富人們的狠毒。一下雨的时候，我們就沒法睡覺，只得滿街串游，或到富人家的大門樓下去睡。可那些富人半夜开开門，向我們身上泼凉水，或拳打脚踢，把我們轰到雨地里去。有的资本家为了寻开心，在大街上看見我們，故意把柿子皮扔在地上，等我們去拣，就用文明棍敲我們的手指头或脑袋。在那个社会，哪里有穷孩子的活路呢？

1948年，唐山解放了，我才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。解放后第七天，全市的流浪儿都被收容到了教养院。全院有二百多个流浪儿，給吃給穿，还讓我們讀書、学技术。1956年，政府又把我介紹到了唐山織染厂做工。后来，就和厂子里的一个女工結了婚，建立了一个美滿的家庭，还添了一个女孩子。

我有时看到爱人爱买东西，就說：

“能节省就节省，別忘了过去的苦日子呀！”

在厂子里我看到有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，

整天注意打扮，不好好生产，我就暗地里生闷气，  
領導上知道后，就找我談話，說：

“不能光生气，要給他們讲你过去的苦，帮助  
他們提高認識呀！”

先前，我总觉得过去的事已經过去了，提那个  
干啥。我現在才明白，不但應該提，而且还需要經常  
提，向所有的青年人提，要使他們認識到过去怎么  
苦，現在怎么甜，怎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出力，  
也使他們懂得忘掉过去就是背叛革命。

忠 臣整理